

#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8月15日第17期 总第163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163期

### 目录

#### 【专稿】

魏格林（德） 中国大陆的记忆文化：以卞仲耘之死为例

萧小红（法） “身份政治”的滥觞：文革时期中共高层的家族与派系集团

#### 【考证】

印红标 榄杆市刀砍红卫兵事件真伪辨

范世涛 “红八月”北京的暴力峰值时间

#### 【广东文革】

叶曙明 1966年广州封闭《红卫报》事件

#### 【访谈】

杨东晓采访 章立凡口述：“红八月”：家庭出身·抄家打人

#### 【述往】

王俊义 木寨小学斗老师

#### 【资料】

北京市档案馆 1966年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动态》摘录

北京市普教资料选编：《“四人帮”在“文革”中对普教事业的破坏》摘录

- 1、西城区原女三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沙×同志被迫害致死
- 2、东城区分司厅中学干部陈××被迫害致残
- 3、各区县落实政策的人数情况
- 4、西城区对文革中中小学教职工受迫害及落实政策调查表

#### 【本刊声明】

## 【专稿】



## 作者介绍

魏格林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所汉学教授。1975至1977年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大学的留学生，1982年为波鸿鲁尔大学东亚学学院博士，1982年至1989年为波鸿鲁尔大学东亚学学院博士后。1989年至2002年为海德堡大学当代中国学教授，1999年至2001年海德堡大学主管国际交流的副校长，2011年被选为奥地利科学院通讯院士。2011年至2015

年维也纳大学主管学术和年轻学者培养的第一副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的中国史学，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历史认同与历史记忆，当代中国政治，特别是公共卫生，环境保护以及民族政策，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政策。

## 中国大陆的记忆文化：以下仲耘之死为例

魏格林 (奥地利)<sup>1</sup>

国外有关文革记忆的研究面临很多社会的、包括学术界的成见。很多人认为有关文革的记忆根本不存在，文革本身早就被中国人忘记。中国共产党不容许中国大陆社会讨论文革，因此社会上不可能有文革记忆。因为文革本身是一场规模极大的社会运动，当时生活在中国的人没有一个没参加过的，对这样巨大的、复杂的事情最好是忘记它。加上文革

<sup>1</sup> 本人从2005年开始从事对文革记忆的研究。当时很多同事说服我这样做，因为他们看过我有关大饥荒记忆的研究，加上作为德国人，我从1960年代起学会了面对自己不幸的过去，而给我以最大推动的，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沙培德 (Peter Zarrow)。因为我跟很多研究记忆问题的研究者不一样，我以文献学为方法论来从事记忆研究，所以我有关文革记忆的历史演变研究，离不开费正清研究中心保存的大量有关文革的资料，但同时也靠我2005年在布兰戴斯大学当访问学者的时候能够在它的图书馆找到的有关记忆的理论性研究著作。

结束之时跟其他以其记忆文化为荣耀的国家和民族不一样，政治制度上没有原则性变化。做出发动文革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文革前的执政者，也是文革后的执政者。在这样的情况下，自上而下去推动有关文革的记忆，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能的。我的研究跟这些成见正相反——关于文革的记忆并非隐藏在中国社会里，它处处可见。在此，我从反映文革记忆

的文献出发，来解释文革记忆的几个特点，理解它的发展趋势，指出其难点和潜力所在。

## 文革记忆特点之一：

### 中国社会没有达成有关文革的共识

虽然文革一开始就有有关文革的记载、争论和记忆，到现在为止，中国社会还没有达成有关文革的共识。王蒙今年年初在《炎黄春秋》上提到，有关什么是文革、文革要达到什么目的、怎样对文革进行评价这些原则性的问题，在文革结束40周年之后，还没有得到回答。<sup>1</sup>官方把文革说成是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样的解释在党内斗争中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但徐友渔说得好：“我们必须正视这一事实：文革得到亿万人拥护。他们真心诚意、狂热地参加到这场政治运动中。”<sup>2</sup>这是为什么呢？中国共产党也好，中国大陆社会也好，还没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

最近《环球时报》发表文章否认这个观点，说中国早就达成了否定文革的共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sup>3</sup>这个决议以前很少有人提到，很多中国人几乎把它给忘记了，国外很多学者一直认为，它不重要。但最近各种各样的人都要提及它，利用它，或者反对它。相较于10年前的文革记忆活动，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区别。造成这一不同的原因很简单，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1981年的决议来统一有关文革的认识，但是它从来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当时在邓小平领导之下的党中央，既不可能

<sup>1</sup> 王蒙：《反思文革责无旁贷》，载《炎黄春秋》2016年第3期。

<sup>2</sup> 徐友渔：《毛泽东争取群众的策略手段——文革反思之二》，《昨天》，第32期（增刊）页6。

<sup>3</sup> 单仁平：《“文革”已被彻底否定》2016年5月17日，环球网，<http://opinion.huanqiu.com/shanrenping/2016-05/8937703.html>。《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人民日报》，1981年7月1日，1-5版

真正地全面地否定文革，自然也就不可能统一党内的思想。1981年距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很近，距“四人帮”被打倒也不远。要不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争论刚刚才过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党内的权力分配不容许全面否定文革。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那样，全盘否定毛泽东。这是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绝不允许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1981年的决议不能以“全面否定文革”来统一文革记忆的原因。

1981年的决议试图用文革人人有责的观点来统一思想，制造共识。决议虽然说，毛泽东的责任最大，但同时也提到有人主动地或被利用地去参与。在既不想维护受难者，又想保护加害者的“两难”之中，党中央找到的唯一出路，就是人人有责。<sup>1</sup>

但是，这样的判断很难被中国社会接受。如果说，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是文革的受难者，大多数人可能会支持这样的观点。以人人有责为理由提出文革没有受难者、也没有加害者的观点。如果分析当时党内各种势力的情况，很可能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党内的需要跟社会上的需要不一致。社会上，受难者希望被平反昭雪；但同时也希望加害者会被批判、被判决。这样才能保证像文革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而曾经在文革当中参加各种暴力活动的人希望最好不要提及这件事，因为怕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到他们将来的发展。如果说人人有责，受难者觉得不公平，加害者觉得很担心。

1981年的决议说“人人有责”，意思是说，没人有罪。这个想法对一部分人非常有利。这就是文革初期在北京特别活跃的所谓“老红卫兵”。其中不少人明明知道他们曾经犯过罪。前几年陈小鲁道歉的行为很能说明问题。但党中央没有把他们当作加害者来对待。表面上看来，这是因为根据当时的情况，很多“老红卫兵”后来也成了受难者。但更重要的原因很可能在于精英阶层以家族为核心单位的事实。当时做出决定的党的主要领导人知道如果把“老红卫兵”当作加害者，他们永远也不能担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这不仅涉及个人的前途，也涉及全家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党的发展前景的问题。他们当时可能没想到，在

---

<sup>1</sup> 更详细的分析在：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Coping wit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esting Interpretations”,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1期（2008年8月），页1-52; “In Search of a Master Narrative for 20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y”,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88 (December 2006), 1070-91.

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另外一个后果会出现，因为没有批评“老红卫兵”，所以也不能保护受难者。这就是为什么1981年的决议在社会上从来没有得到重视与承认的原因。党中央希望达成共识，却没达成共识；党中央希望能够解决派性问题，却没有解决派性问题。这样就产生了文革记忆的分散性问题。

## 特点之二：

### 文革记忆是分散的

文革记忆的分散性有不同的表现，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既没有争取到文革话语的主导权，也没有能够设立有关文革的话语禁区。以上已经对为什么中共通过1981年的决议没能说服人作过解释。而决议缺少说服力是中共没法掌握文革记忆这个话语空间的主导权的主要原因。邓小平在决议发表以后马上表示有关文革的讨论应该到此结束，从此之后，中共确实想办法来设立有关文革的禁区。但看起来好像设立禁区的想法虽然越来越强，社会上讨论文革的需求却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需求的反应是，有时放松对文革的公开争论，有时尽量压制回忆文革的话语空间。结果，党因为未能设立禁区，越来越不能掌握有关文革的话语空间，而社会，因为党没有掌握好话语空间，所以越来越成功地占领了这个空间。不过，社会上像在文革时期一样，对文革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观点，因而产生不了有关文革的共识。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没法说服社会来接受它的解释，而社会本身因为四分五裂，也没有能力来制定这样或那样的共识。这就引起文革记忆的分散性，而这个分散性主要表现为不同记忆团体的同时并存。

记忆团体的概念是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在研究美国黑人记忆认同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记忆团体（Carrier Groups）指的是以同样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组成的、曾经在同一个地方和同一的时间阶段经历过同一个历史事件而产生的“内部人”

团体。<sup>1</sup> 在文革这个范围之内，可以说今天的记忆团体是文革的活动团体的继续，它们以在文革时期的共同活动经历为出发点和基础，目的在于创造有关文革中所作所为的共识和符合这个共识的一个叙述。记忆团体很少把自己的存在公开化。这是为什么不少人认为有关文革的讨论在中国社会上不存在。记忆团体在一般情况之下不会公开地跟其他记忆团体争论。它的活动主要的是为了在原有的圈子里面保持或重新建立友谊与信任。曾经在同一个地方上山下乡的知青最近几年开会来回忆他们当时的经历，是这种记忆团体活动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有时候他们也会把自己的活动公开化，那是为了在社会上争取承认，给自己增加光荣。

### 以宋彬彬道歉为例

宋彬彬 2014 年 1 月公开向卞仲耘副校长的家人道歉。通过她和她的同学的活动可以了解到更多的记忆团体的特点。这个记忆团体的一部分成员大概从 2000 年起单独地从事对 1966 年 8 月 5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所发生的殴打学校领导，打死卞副校长的研究。2012 年在《记忆》杂志的第 80 期上，宋彬彬和记忆团体的一部分成员发表了她们有关“八五事件”的回忆和研究成果。在题为《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的文章里面，宋彬彬指出：“文革爆发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面对社会上关于‘宋要武’的传说我一直保持了沉默。一方面是因为传说不等于事实；另一方面我深知自己无论说什么都只会引起更大的波澜。想到文革中那么多人受到冤屈、迫害，甚至致残、致死，和他们相比，我这又算得了什么，不说就不说了。……在寻找真相和反思自我的过程中我最终明白，再继续沉默，不仅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那些因说了真话而直面社会质询和责任难负的校友们的伤害。我应该讲了，哪怕风波再起，哪怕再次面对灵魂的拷问。”<sup>2</sup> 虽然表

<sup>1</sup> 参见魏格林，崔金珂：《〈历史决议〉：共识与和解——文化革命的记忆战场》。《二十一世纪》文革特辑，2016年8月，待出版。（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Cui Jinke, “Whodunnit? Memory and Politics Before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27, September 2016, 未出版）。

<sup>2</sup> 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记忆》2012年第80期，3页。

面看来，宋彬彬只是在解释她为什么把自己有关“八五事件”的叙述公开化，但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她实际上给我们讲的是整个记忆团体的基本纲领，既把当时所发生的事实弄清楚，以事实为根据进行反思，把责任落实得合情合理。

刘进作为记忆团体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成员，在《记忆》杂志对她进行采访时说明，她早就开始对“八五事件”进行反思。她不仅仅在1978年参加了卞副校长的追悼会，她也以几次被审查来说明，她当时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卞副校长被打死的过程。1990年代初，她根据自己的研究给学校写了一份报告。<sup>1</sup>她解释说：“原来做这个调查，没打算公开。宋彬彬也觉得这辈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自己的罪名了。我们只能交给学校，留待后人评说。后来冯敬兰出现了，是她推动我们一直往前走，并寻找机会和平台，让我们公开说出‘八五事件’的真相和自己的文革经历。”<sup>2</sup>虽然宋彬彬、刘进和叶维丽好几次找机会讲出她们对“八五事件”的理解，但社会上的反映不强。只是到了2014年的1月，宋彬彬的公开道歉才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应，使得“八五事件”一下子成为文革初期红卫兵暴力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事件。

记忆团体的成员很认真地对“八五事件”进行回顾与反思。她们不仅仅树立了一个她们眼里的事件的真相，也说明了事件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刘进说：“道歉只是反思的第一步”<sup>3</sup>，她提出，当时这样的暴力能出现主要的原因在于“党报舆论把革命与暴力等同起来”<sup>4</sup>，这使得学生，特别是高干子弟，认为要接好班就应该采取暴力行为。刘进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是被利用的。”她进一步指出：“自己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灾难，是因为在思想上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sup>5</sup>不过，她也承认，因为当时响应报纸上的各种号召，影响了其他同学，自己应负一定的责任。<sup>6</sup>

<sup>1</sup> 本刊特约记者：面对历史的责任。刘进访谈录，《记忆》2012年第80期，16-18页。

<sup>2</sup> 刘进：《“八五”反思》，《记忆》2014年第106期，26页。

<sup>3</sup> 同上，24页。

<sup>4</sup> 同上，25页。

<sup>5</sup> 同上。

<sup>6</sup> 同上，30页。

在这一点上她跟其他记忆团体的成员观点一致。宋彬彬也认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她们对卞副校长之死没有直接的责任，但她们还是得负其中一部分责任：“如果我们和更多的学生群众当时就有法制观念，可能不仅卞校长，而且女三中的沙坪校长，八中的华锦书记等许多的校领导和老师或许就不会死于非命。十年的调查研究，使我逐渐认识到：查清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事件不仅是我个人和女附中的事。道歉不仅是为了安慰个人的良心，还是要让后代记住历史的教训。”<sup>1</sup>

革命教育比法制观念强，它使得学生认为应该用暴力行动来表现自己的革命性。这个分析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它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学生没有法制观念，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是可以理解的。但学生没有道德观念，这个问题很难理解，而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道德问题在当前讨论中好像几乎没有出现。如果从道德的角度来看问题，就会发现，树立真相，进行反思，落实责任是一个很有道理的记忆过程，但如果说，这个过程的目的为社会做出贡献，达成共识，那么共识不能以一部分人的真相为基础。对像文革，像文革中的“八五事件”那样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不可能只有一个。不同的参与者对这一事件有不同的视角。特别是加害者、参与者与受难者对同一个事件会有不同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在反思过去的过程中应该采取一种多维度的方法来寻找真相。真相不是绝对的，它是相对的。它是不同视角之间谈判的结果。只有这样，树立真相才可以为达成共识服务。

记忆团体内部树立真相存在着一种缺陷——为了内部的团结，记忆团体可以调解内部对一事件的不同回忆，但因为记忆团体的成员都是用相同的方法来参与同一的事件，所以他们往往只能代表对事件的回忆的一个侧面。宋彬彬的记忆团体的成员给自己定位的是间接参与者的角色，因此她们也只能代表间接参与者的视角。所有的成员都说自己没有直接参与殴打卞副校长。她们认为自己的责任只是间接的责任。而不参加这个记忆团体的人，如王友琴，则认为她们所负的不仅仅是间接者的责任。作为受难者家庭的代表，卞仲耘的丈夫王晶珪先生也没有参加这个记忆团体，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记忆团体不仅没有担负起

<sup>1</sup> 宋彬彬：《我的反思》，《记忆》2014年第106期，33页。

全部责任，也没有提供她们认为应该担负直接和全部责任的人的名字。<sup>1</sup> 在王友琴和王晶垚等人看来，不管她们主观上是怎么想的，她们通过自己的道歉和反思活动，保护了应当担负起直接责任的那一批同学，使受难者家属还是不知道直接打卞副校长是谁。所以他们不能接受道歉。

这就是文革记忆的现状：加害者不道歉，继续保持沉默，觉得没有必要来担负起责任。而间接责任者的反思，却很快就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批判。

记忆团体对“八五事件”反思还产生了一个后果：因为对“八五事件”的代表性估计不足，记忆团体没预料到跟这件事本来没有多少关系的人，会利用她们的反思过程的不足而大做文章，批评所谓“红二代”和他们跟后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关系。

从这个经验可以看出，记忆团体一旦把自己的叙述公开化，就马上会碰到其他叙述，并且其他叙述不一样，原因不仅仅在于对同一事件的视角不同，也是因为代表的社会利益团体不一样。最近毛派对宋彬彬道歉的批评，很明显地带有利益团体之间矛盾很激烈的痕迹，同时也带有文革时期红卫兵与造反派之间斗争的痕迹。<sup>2</sup>

## 多维度的、跨过界限的反思

文革实际上是一个自上而下发动的内战。内战的结果是出现了国家虚弱、社会强大的一个局面，因此在有内战的情况下，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矛盾爆发出来，给内战后的社会留下的痕迹很深。其中道德方面的过错留下的痕迹最深，并且克服这种过错感最为难。这一点在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中，令人体会深刻。<sup>3</sup> 内战后重新去树立一个社会的道德观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但跟以上提到的真相一样，它不是绝对的，它是被不断地重新构造的，这是一个重新结构社会的产物。对过去不幸的反思，实际上是重新建立

<sup>1</sup> 参见魏格林，崔金珂：《〈历史决议〉：共识与和解——文化革命的记忆战场》，《二十一世纪》文革特辑，2016年8月，待出版。

<sup>2</sup> 参见：魏格林，崔金珂：《〈历史决议〉：共识与和解——文化革命的记忆战场》，《二十一世纪》文革特辑，2016年8月，待出版。

<sup>3</sup>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

被内战摧毁的道德观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如果不跨越原来敌对的界限，就没法完成。

一个内战后的社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记忆团体来消化所发生的一切，这是自然而然的一个现象，这些记忆团体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起码会存在到参与事件的人死亡为止。问题就在于怎么样在记忆团体存在的条件下克服其狭隘观点建立社会共识。这里最有效的是引起一个跨越敌对观点的过程，使得参与者虽然在事件发生时持有敌对观点，但在事件过去之后学会理解他们原来的敌人，理解他们的动机，他们想法的合理性。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不管你是受难者，加害者还是参与者，人人要学。

跨越敌对界限的思维方式要求采取一种多维度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承认对一个事件的判断不可能只有一个。不同的角度会产生不同的判断。只是在对比分析不同角度产生的不同判断之后，才能够知道哪一个判断根据现在所知最为正确。根据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观点，社会问题只能通过公共讨论才能够得出一个让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结论。这个结论被认为是正确的，但这个正确也只能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因此它只能是相对的正确。

中国社会在文革结束之后，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向革命告别。遗憾的是，恐怕在处理社会矛盾的问题上，虽然向革命告了别，但并没有向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告别。这一点，通过对文革反省的分析过程，即可以看出。 ■

---

本文系魏格林教授提交给2016年4月在德国科隆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纪念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地方文革史新视野”的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本刊经作者授权刊发。

## 【专稿】

## 作者简介



萧小红 (Xiaohong Xiao-Planes), 1983 年赴法国留学, 1990 年获法国社会史博士学位, 1997 年获中国现代史博士学位, 2005 年获法国博士生导师学位, 随后担任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国史教授。最初研究法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罢工运动史, 以后转向中国近现代史, 曾经研究清末民初的江苏教育会及其姊妹团体 — 民国时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 1930 年代上海地方协会及职业救国会团体等。近年关

注的课题包括抗战时期内迁到四川大后方的沿海工厂, 1950 年代上海工商业改造过程中政府与企业主关系等, 以及与中国当代政治史、社会史有关的一些问题。

## “身份政治”的滥觞：文革时期中共高层的家族与派系集团

萧小红（法国）

内容摘要：毛泽东为了实现反资反修的宏大蓝图，打破中共七大建立的“延安圆桌”的权力格局，扶持江青、康生为首的激进文人集团和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发起了一场冲击现行官僚体制的文化大革命。然而这些集团并不甘心仅仅扮演革命工具的角色，而是顽强地发展家族、派系的势力以争夺最高权力。派系政治的排他性和残酷性也迫使失势者及其家族成员动员他们所属派系的资源作拼死的抗争。文革时期的中国高层权力格局具有强烈的家族与派系色彩，这跟中共一贯的体制，以及文革揭发的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目标，形

成了极大的反差。由此形成的“身份政治”严重影响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行，导致权力的滥用，资源分配的不公以及价值标准的扭曲。

西方的中国政治史学家用“延安圆桌”一词，来称呼1945年中共七大形成的领导团队，它指的是当时中共高层确立的以毛泽东为首的、统合党和军队各派系力量的权力结构。1954年这个团队在经历了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分裂危机之后，<sup>1</sup>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美国政治史学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指出，文革开始之前的几年里，毛泽东怀疑站在第一线的许多高层领导“有独立的地位和权威，并在自己身边使用那些只对他本人忠诚的逢迎者，而不是对党、对马列主义和同事们的忠诚者。他这样剥夺了中国的一份无价财富，即一个团结的有才能的领导层，延安圆桌，那个‘精选的群体’，它征服了中国并指导她经历了建设国家的早期阵痛。”<sup>2</sup>

文革开始之后，在毛的大力支持下，他的妻子江青和以康生、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占据高位，掌握重要权力。毛选中的接班人林彪元帅的家族及其在军队中的派系，在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前，同样具有炙手可热的权势。可以说，文革时期的中国高层政治具有强烈的家族与派系色彩，而这跟中共一贯坚持的体制，以及文革揭橥的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根本目标，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家族与派系政治的影响会败坏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行，它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资源分配的极大不公。在近年出版的一些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对文革时期中共上层的家族与派系政治的表现方式作初步的探讨。

<sup>1</sup> 关于“延安圆桌”团队经历“高饶事件”危机的经过和结局，见 Teiwes, Frederick C.,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Armonk (N.Y.); London: M. E. Sharpe, 1990. 黄靖的著作从中共派系结构与派系争斗的角度，对事件进行了另一种解读：Huang Ji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chapter 4: «The transition of the Yan'an Round Tab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73-210.

<sup>2</sup> Roderick MacFarqu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 III: *The Coming of the Catalysme, 1961-196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中译本]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马若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浩劫的来临 1961—1966》，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第452页。

借用英国 19 世纪的古代法制史学家亨利·梅因的民法概念“身份”一词，我尝试使用“身份政治”这个概念来分析文革时期中共高层发生的家族与派系政治现象。梅因指出，“在‘人法’（指古代法）中所提到的一切形式的‘身份’都起源于古代属于‘家族’所有的权力和特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到现在仍旧带有这种色彩<sup>1</sup>。”“身份政治”的含义即一个人享有的权力和其他特权来自于他所属的家族和派系（派系可以视为家族血缘关系的延伸），而不是他本人因为政绩或功勋在权力结构中的表现。

文革时期的“身份政治”的特点，是它同时具有革命意识形态的包装。江青和林彪不仅分别是毛泽东的妻子和他选定的接班人，他们还分别享有文化革命的旗手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副统帅的称呼，而毛本人则掌握了某种绝对真理，即通过不断的继续革命从而避免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他甚至是这一绝对真理的化身。在这样的语境中，跟毛最接近的人，他的亲属及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享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可以诠释革命，褒贬他人，甚至指点江山。这种与领袖个人紧密相联的权力渊源，与以血缘为基础的法权关系非常相似，子女与妻子的权力地位源于他们的父亲或丈夫，所谓“身份”，指的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以及扩大的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法权关系及其在政治上的表现。

在一个现代社会里，身份政治对公共权力以及行使者本人都贻害无穷，毛泽东本人对此有一定的认识。中国官方出版的有关文献表明，在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召开的前后，毛泽东开始采取种种措施，试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帮派政治的发展。然而，1971 年的“九·一三”事件以及后来发生的“四人帮”的形成，表明毛在这方面努力的失败。

林彪和江青帮派集团是毛本人精心扶持用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工具。然而这些工具并不总是听从主人的指挥，一旦占据权力中枢的有利地位，他们难以避免地要遵循家族、派系政治的逻辑争夺最高权力和独占政权。对最高“家长”身份继承权的争夺是永无止境的，并非毛泽东一人之力能够制止。

---

<sup>1</sup> Henry Sumner Maine : *Ancient Law,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 (1861). [中译本] 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111—112 页。众所周知的梅因名言是“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其次，家族、派系政治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它激化观点和立场的分歧，将权力竞争游戏变为生死斗争，因此必然引起失势者的拼死抗争。我们将会看到，后者的抗争也主要依赖家族和以往所属派系的力量，这是政治斗争中失势的高层领导人唯一可以动员的资源。

最后，高层领导的“身份政治”会导致不公平、非正义的权力机制和社会秩序：一个人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可以惠及家人、亲属及其亲近者。反之，一旦某人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同样会累及家人、亲属及随从<sup>1</sup>。文革时期的高层权力是高度个人化和家长化的，如果将中共最高层干部限于文革开始时担任部委、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现职以上的主要领导人<sup>2</sup>，可以看到所有这些人的政治生命都直接掌握在毛泽东这个最高家长一人的手中<sup>3</sup>。

在“身份政治”这样的一种权力机制中，高层干部的身份变动也意味着他本人和家庭的势力和能够支配的资源的消长起伏。毫不奇怪，在煌煌的革命语言笼罩一切的同时，“开后门”和“找关系”的行为方式逐渐蔓延，成为党政军从上到下整个权力机制的润滑剂。

本文是对文革期间中共权力机制演变过程的一个初步解读。由于本人对有关文革和中共高层政治的资料掌握有限，肯定会有不少舛误之处，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 一. 毛、江青和家人与随从

中共高层领导结构是高度男性化的，男性占据了权力中枢的绝对主导地位，女性的人

---

<sup>1</sup> 文革之后，许多林彪和江青集团的成员与家人，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然而，正像他们所说，很多时候，这些不公正的待遇主要地来自他们所属部门对政治失势者的无情处置，后者甚至拒绝执行高层落实政策的有关决定。这种情况可以看作是“身份政治”带来的后果之一。

<sup>2</sup> 很难确定担任这一级别现职的中央、地方以及军队的高级干部的总人数，很有可能在一千至两千人之间。关于他们的基本情况，可以参照历史学家沈志华对中共八大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构成的分析。沈写到“从选举的原则看，中共依然无法跳出“论资排辈”和“打江山者坐江山”的窠臼。毛泽东提出的“三八式”干部一般不选入中央委员会的原则被代表们所接受。其结果只能是把一批稍有现代知识的干部摒于领导层之外。在170名正式中委和候补中委中，大多是刚刚脱了军装的职业军人，他们久经战场洗礼，习惯于服从命令和发号施令，却缺乏组织经济建设的经验和必备知识。不过，这也是中共党员成分的实际反映。八大时，中共党员1073万人，其中工人党员占14%，农民党员占69.1%，知识分子党员占11.7%。中央委员会的这种结构，也就是当时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的基本状况。在毛泽东看来，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引自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运动（1956-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卷，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版，第317页。进一步的分析参见第317页—322页。

<sup>3</sup> 在不久之前出版的《毛泽东年谱》第六卷中，充满了文革时期，尤其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对每一个高层领导人是否能够获得“解放”和可以享受何种政治待遇的批示，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2013年版，第六卷。

数非常有限，并且主要是在全国妇联、文化宣传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如蔡畅（李富春副总理夫人）、康克清（朱德夫人）、邓颖超（周恩来夫人）等。许多男性领导比较年轻的妻子被指派担任她们丈夫的秘书，通常主要负责照顾生活，例如江青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王光美担任刘少奇的秘书，叶群担任林彪的秘书等等。还有一些领导人的妻子，因为陪同丈夫参与外交活动，在公众场合频繁出现，成为具有视频形象的公众人物，如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外交部长陈毅副总理的夫人张茜等人。而江青作为毛泽东夫人在高层圈子频繁出现，仅仅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两三年。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江青通过推动现代京剧的改革，创作“样板戏”，参与对音乐、美术、戏剧、电影各类“毒草”作品的揭露和批判，活跃在文化、宣传领域。1965年11月，受毛泽东的指示，江青在上海组织编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966年2月江青得到林彪的同意，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在当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此后又担任代理组长和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sup>1</sup>。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的回忆文章都指出，江在这个机构里具有极大的权威，因为她经常可以从毛那里带来最新的最高指示<sup>2</sup>。作为组长的陈伯达完全不能指挥她，而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是这一时期江青的强有力支持者。江青在接见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时，或是在各类公众集会上，常常声称自己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表示支持某派，反对某派，点名某某人应当被揭露和批判等等，而毛泽东则长期默许江青的这种“身份移植”行为。1967年发生军政元老对抗文革新进的“二月逆流”之后，原先主管国家日常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碰头会被中止了，它的职能由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接替，直至1969年4月中共“九大”成立新的政治局为止。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江青权势最

<sup>1</sup> 有关文革发动以前的背景材料，主要取自前引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马若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浩劫的来临 1961—1966》；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5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6卷，出版社及日期同上。

<sup>2</sup> 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

大的时候，常常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政治命运甚至生死。林彪集团垮台以后，江青和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获得很大权势。江本人是中共九大和十大的政治局成员；在政府系统中，她在文化、科教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力和甚至相当的决定权。但是毛泽东始终遏制江进入政治局常委以及在国家机构中掌握更高权力的愿望。1974年以后更是跟江青明确切割，在政治局会议上声明说“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尽管如此，毛每次需要发动新的运动，例如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投降主义、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江青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关键人物<sup>1</sup>。

我们再来看毛泽东的其他家人。

李讷（1940—）是江青与毛泽东唯一的女儿，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以后参加“四清”一年。1966年7月初，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钓鱼台宾馆设立办公室，李讷改名肖力进入该机构工作，主要工作是到北京各高校了解情况，同造反派头头接触，以后又跟同学到外地串联。李讷常常出入她父母的住地中南海和钓鱼台，所担负的任务似乎主要是为她父亲了解基层情况，传递信息。她还享有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看同样文件的权利<sup>2</sup>。1967年初她回到她的工作单位解放军报社，和其他一些人在报社造反夺权，得到林彪的支持和毛本人的首肯，半年后再次造反，取代新上任的总编和党委书记，成为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相当于总编辑）<sup>3</sup>。中共九大，很多造反派著名人物成为代表，甚至擢升显赫的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但是毛泽东没有同意李讷和毛远新当九大代表<sup>4</sup>。1970年初遵循其父的要求，李讷赴江西中央办公厅的五七干校锻炼。1973年8月中共召开十大，李讷和毛远新两人都成为代表，但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1974年至1975年李讷先后担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平

<sup>1</sup> 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情况，主要取自前引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批孔到批邓（1972-1976）》，《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8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Macfarquhar Roderick et Schoenhals Michael：《La Dernière Révolution de Mao —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1966-1976)》，Paris, éd. Gallimard, coll. nrf, 2009；Walder Andrew G.,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Harvard U. P., 2015；Chap. 9-13, p. 180-314. 以下除必要时，不重复注出。

<sup>2</sup> 阎长贵：《肖力（李讷）在中央文革小组》，同上书，第167-177页。

<sup>3</sup>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第440-44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2013年版，第6卷，第35页。1969年1月，毛批示“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

<sup>4</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26页。

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她显然是一个忠于父亲和领袖革命路线的实践者。尽管毛没有安排让自己的后代直接担任他的继承者，但是允许他们占据相当高的领导岗位。

在毛泽东的近亲中，他的侄子毛远新（1941—）和他表兄的外孙女王海容（1938—）在文革时期都得到快速的提升，并且由于跟毛的特殊关系，在政治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sup>1</sup>。毛与王海容、毛远新的特殊关系始于1964—1965年毛与他们进行的一系列有关教育革命的谈话<sup>2</sup>。这些谈话通过高等教育当局，军队以及内部传播的渠道，为许多学生知悉，尤其是许多地方和军队高级干部的子女。毛不满意和不信任体制内的许多文化、教育机构，他采用跟他家族的年轻人谈话的方式传递信息并且听取基层学生的反馈。然而，在北京和其他地方干部子弟人数集中的学校里，这些讲话似乎传递了另一种信息，很多学校的领导人相信高级干部的子女是天然的革命接班人，应当比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得到优先培养。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录提到他们所在的学校设立专门的干部子女班级或是举办仅有干部子女参加的专门的政治学习会议。

毛远新1965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由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安排到云南某导弹师任排级干部<sup>3</sup>。1966年9月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母校哈军工参加造反队伍，并成为著名造反派组织的领袖。1967年春夏，他从东北回北京，担任周恩来的联络员，帮助处理东北两派的联合问题，随后成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付主任，省委书记和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始终是他伯父革命意识形态及路线的忠实跟随者和执行者。历史学家史云指出他在辽宁当局1975年4月处决张志新的案件中负有一定责任，张的罪名是批判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错误。1973—1974年期间，毛远新配合毛教育改革的宗旨，树立反对右倾回潮（张铁生的“白卷事件”、朝阳农学院大学生“社来社去”）的样板人物与办学经验。不过他扮演的最重要的政治角色，很可能是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阶段，1975年10月至1976

<sup>1</sup> 本节有关毛泽东任用王海容、毛远新及迟群、谢静宜等人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批孔到批邓（1972—1976）》。

<sup>2</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96—97页；第177—178页。

<sup>3</sup> 该信息系余汝信先生提供，特此致谢。

年9月期间，担任毛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由于这时周恩来和毛泽东身体状况恶化，高层派系之间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趋于白热化。作为一个坚定的文革支持者，毛远新利用为毛泽东传递信息的方便，在邓小平第二次倒台的政争中据说扮演了非常主动的角色<sup>1</sup>。

王海容于1965年进入外交部办公厅工作，1971年起担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部长助理，1974年7月至1979年2月成为显赫的外交部副部长。她和她的同事、翻译唐闻生经常跟毛泽东见面，为毛传递消息并转达毛的指示，被一些史学家看作毛安排在外交部门监督周恩来的人物。1973—1975年之间，这两人成为实际上的毛的联络员，权势之大连江青、康生、邓小平都要通过她们向毛传递信息或者探询后者对有关事务的看法。

除了家人以外，毛还非常重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文革之前，他就用长期负责他个人警卫工作的汪东兴替代了原先的中央办公厅秘书长杨尚昆。1968年他派遣中南海警卫团8341部队的军官迟群等人以及他的机要员谢静宜进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此后这两人长期担任两校主要领导。他们在毛的直接指挥下，掌控两校作为教育革命和舆论阵地以及进行新的批判运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投降主义、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的试点基地。迟群还担任了教育部、国务院科教组的重要职务，而谢静宜尤其得到毛的青睐，出任北京市委常委、书记，并于1973年成为中共十大的中央委员以及两年后召开的四届人大常委。

文化大革命由毛泽东以最高领袖的名义发动，毛的家人和他的亲近者从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政治身份”：相比其他人，他们自视和被视作天然的革命者，比他人更能正确领会领袖的意旨并得到后者的直接支持。他们具有的这种革命性是其他人无可比拟的，因为它来源于血缘和婚姻关系（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以视为一种扩大的家族关系）。所有这些人得到权位都来自他们共同的家长——领袖，并且无条件地认同后者发起的文化大革命。现今的研究表明，毛没有意图提拔妻子或子女担任他的接班人或者占据有实权的高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甚至不断警告江青及其集团不要搞山头、宗派主义。然而，他培植、使用家

<sup>1</sup>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批孔到批邓（1972—1976）》，第 588—589；613；639—640页。

族集团的做法极大地败坏了中共的权力中枢本身，使一个原先实行各派协调的机制蜕化为派系之间激烈争夺和互相排斥的战场。毛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促使其他派系采用同样的手段发展它们的势力。

## 二. 林彪、叶群家族及其军事集团

林彪集团以军队为基础，主要班底是瑞金时代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及其改编的第一军团的将领，这支队伍也是毛本人在权力结构中的力量基础<sup>1</sup>。1967年7月以后，林彪集团控制了中央军委办事组，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指示下，处理军队日常事务，在中央军委下属的主要部门和军种中掌握重大权力。1968年3月杨成武代总参谋长被清洗后，形成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的核心集团。1969年4月中共九大林彪成为党中央副主席，毛的法定接班人，叶群等其他五人全部进入中央政治局。林彪集团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跟随者都有大批人进入九大中央委员会，此后双方激烈争夺继承权。

林彪集团具有强烈的家族色彩，林藉口身体原因，很多公众场合与重要的会议，都由妻子叶群出面。1965年末她参与了倒罗瑞卿事件，文革开始后，她担任了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副组长，林彪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1967年2月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军政领导反对文革进行的方式方法，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争吵（即所谓“二月逆流”），被毛泽东勒令检讨，许多人因此靠边。此后毛让叶群代替林彪参加由他或周恩来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自此叶群获得了跟江青同样的特权，参与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最高决策。<sup>2</sup>不过一般来说，叶群总是谨慎地避免跟江青直接冲突。

叶群的身份和地位显然要比江青低一级，但是她有强大的军队靠山，所以尽管两人的势力都来自于她们的丈夫，但叶群比江青能够动用的资源似乎更多、更直接，因为军队在

<sup>1</sup> 关于毛本人在延安圆桌结构中的派系基础，见前引Huang Ji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2000).

<sup>2</sup> 吴法宪：《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659页。有关“二月逆流”经过的叙述，见第657—667页。

国家机器里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体系并拥有雄厚的资源。作为母亲，叶群极其关注她和林彪的一双儿女林立衡与林立果的个人前途与婚姻问题，<sup>1</sup>为此不惜动员可观的军队力量，在全国各地挑选有望成为儿女对象的候选人。在个人前程方面，林家两姐弟都被安排在空军工作，后者被认为是一个技术含量高的兵种。林立衡（1944—）于1965年进入《空军报》工作，文革后提升为该报副总编辑。弟弟林立果（1945—1971）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文革时停课，于1967年4月参加空军，任空军司令部参谋（一说办公室秘书），不久入党。1969年10月经吴法宪安排，将林立果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在回忆录里还明确说，林家姐弟两人所提升的职务都刻意安排得比毛远新和李讷低一些<sup>2</sup>。吴法宪告诫空军党委的同事说，“林副主席把立果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对空军的支持。我们一定要把立果培养好。”吴为林立果提供种种条件，培养威信，并让林享有组织调研小组，到空军下属部队活动的权力，甚至允许他直接向林彪汇报空军有关工作以及调动、指挥空军力量。林立果及其一伙年轻军官肆意妄为的活动，最后导致了他跟父母林彪和叶群一起葬身的“九·一三”事件。针对林彪与妻子袒护儿子滥用权力，毛泽东曾尖锐地批评说，“死党只有那几个，主要是叶群，从去年到今年主要是林立果，连他父母也不相信了。”<sup>3</sup>毛还指责林彪让自己的妻子担任办公室主任，实际上是他自己批准叶群担任这样的职务，并且代替林彪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

在某种程度上，叶群确有把中央军委当作扩大的家族事务来管理的倾向。1968年3月杨成武被清除后，她为了防止内部纠纷削弱集团的力量，让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

<sup>1</sup> 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曾经是林立果在北京四中的同学。据他说：“父亲从来不跟我们讲他工作上的事，文件也不让看。但有的高干父母让看，如林立果，林彪刻意培养，让他看内部文件、大参考，所以大家很爱听他讲内部消息。干部子弟比较关心政治，常常扎堆聊这些。”《陈小鲁访问记录》，2013年5月1日（访问记录稿经接受访问者本人校订）。

<sup>2</sup> 吴法宪：《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第708—711；769—771页；顾训中：《我在空军部队经历“九一三”》：“空军是当年副统帅林彪亲自树立的全军标兵，在毛泽东提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后，林彪提出了“解放军学空军”的号召。他的一双儿女又先后被安排到了空军工作，女儿林豆豆于1965年上半年到《空军报》当记者，后来成了该报副总编辑；儿子林立果于1967年初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后改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当秘书，后来当上了司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两人都是“一步登天”，被越级拔为副师职干部。”<http://prc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4/05/REMEMBRANCE-No-75-2011年9月13日.pdf>。

<sup>3</sup>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批孔到批邓》（1972—1976），第14页。

作鹏的妻子都担任了她们各自丈夫的办公室主任，以防“后院起火”。这些女士们也积极参与与她在各地为其子女遴选对象的活动<sup>1</sup>。叶群还非常关心黄、吴、邱、李的子女，尤其把年龄大一些的男孩和林立果同样看成是他们的父辈在军队的当然接班人。黄、吴、邱、李的子女大多在文革初期参军并且得到快速提升。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上述四人的妻子和子女都受到株连，大多被长期关押、审查。此后很多人成为受歧视、排斥的对象，工作及生活待遇等问题长期无法解决，需要通过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亲自干预才有望化解，而且即使如此，下面的具体办事人员也不一定实行<sup>2</sup>。政争中失势者的困境充分显示了“身份政治”的弊端与危害，即由血缘关系来决定个人的权利、地位和声誉。林彪是这个军事派系集团的首领，“九·一三”出逃事件据说导致军队数十万干部受株连，许多人后来被作为“三种人”清除出军队。1959年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扩大到县级以下，结果揪出几百万大大小小的“彭德怀”，然而那时还可以说多少有一点路线分歧。而文革时期的派系斗争往往都是为了争夺派别、家族与个人的权力与利益。

### 三. 失势派系的抗争

文革时期的中共高层政治斗争极其残酷，一旦男性领导人倒台，他的妻子、子女甚至近亲与下属都可能受到普遍的牵连。这种状况迫使失势的家族动员一切可能的人力与资源进行抗争。在这场较量中，家庭首当其冲地站在第一线，尤其是女人跟孩子，而原来从属的组织系统则成为可以动员的主要资源。我们可以用新四军一师与苏中军分区的主要领导人叶飞、钟期光、陈丕显等人的情况为例进行考察。

新四军组建于抗战初期，由原中央红军遗留在南方的游击队，以及延安派遣南下的一

---

<sup>1</sup> 邱会作的夫人胡敏自1968年10月调解放军总后勤部担任办公室主任，由于丈夫问题的株连，“九·一三”事件后她被关闭和管制劳动十年。邱认为“胡敏真正的错误是为叶群家‘选美’跑了不少腿。‘选美’是极坏的风气，造成极坏的影响……当时，为叶群家‘选美’的高级干部老婆不乏其人。”见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下卷，第958—963页。

<sup>2</sup> 程光：《往事回眸》，香港，北星出版社，2012年版（程光系邱会作第二子）；《光环与阴影——黄春光口述史》，载米鹤都编撰：《光环与阴影——回忆与反思口述历史之四》，香港，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1页（该文包括邱会作的长子邱路光在访谈中的插话）。

部分八路军组成。抗日战争期间，这支队伍在华中地区建设中共根据地和扩大武装力量，解放战争时编为华东野战军及第三野战军。1949年以后，许多新四军将领及根据地的干部担任了华东地区的领导或军队领导人。文革之前华东六省一市的第一书记分别为谭启龙(山东)、江渭清(江苏)、陈丕显(上海)、李葆华(安徽)、杨尚奎(江西)、江华(浙江)、叶飞(福建)<sup>1</sup>，其中好几位都是原新四军旧人。与此平行的军政机构南京军区，主管除山东以外的华东五省一市，它的基本队伍也来自新四军、华东野战军以及后改编的第三野战军和华东军区。这些地方军政大员在北京的老首长主要是陈毅元帅和粟裕将军等人。中共当局严禁干部从事派别活动，并且周期性地进行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批判整顿。但正如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所说，“党内的山头是历史形成的。父亲是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的创始人和解放战争中华东野战军的领导人，解放后到北京，跟新四军老战友的联系就比较多，在地方工作的老战友来北京出差开会，父亲会请他们吃饭。”原新四军的干部跟其他派系的发生人事龃龉，毛泽东也会委托陈毅去调解<sup>2</sup>。碰到严重的家庭困难或者政治厄运，新四军与苏中根据地的干部也会主动提供互相援助<sup>3</sup>。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批判

---

<sup>1</sup> 中共中央地方局设立于1945年解放战争时期。1954年发生“高饶事件”，随后为防止地方势力坐大，撤销了六大中央地方局(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1961年1月又重新恢复。华东局下属华东六省一市包括山东、江苏、上海、安徽、江西、浙江和福建。

<sup>2</sup> “党内的山头是历史形成的，父亲是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的创始人和解放战争中华东野战军的领导人，解放后到北京，跟新四军老战友的联系就比较多，在地方工作的老战友来北京出差开会，父亲会请他们吃饭。1955年评定军衔，就是照顾历史和各方面，兼顾红一、二、四方面军和后来的四大野战军加华北野战军等。1958年彭德怀与粟裕之间有问题，毛让我父亲先找粟裕了解情况。后来福建军区司令韩先楚(四野)与政委叶飞(三野)有矛盾，也是叫父亲去解决。1964年前，春节时，中央领导干部还可以一起吃饭、团拜，后来党内斗争激烈，大家往来就少了。”引自《陈小鲁访问记录》，2013年5月1日。

<sup>3</sup> 如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夫妇曾先后帮助过陈毅的儿子和钟期光的女儿来上海治病。1958年夏，军队进行反“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斗争，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与政委钟期光受到批判打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和夫人王于畊专门邀请处于逆境中的钟期光夫妇与其他两对生病的新四军一师的战友夫妇到福建休养。见陈丹淮、叶葳葳：《三个新四军女兵的多彩人生：回忆母亲张茜、王于畊、凌奔》，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邓小平被迫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此次会议的宗旨是批判体制机构压制下面造反，地方大员们在忠于毛泽东路线和不理解毛的文革运动之间无所适从。叶飞告诉他的妻子王于畊说，会议期间陈毅曾请华东各省市第一书记吃饭，告诫大家说“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篙草，那边风大，就往那边靠<sup>1</sup>。”然而，半年之后，试图坚持党内制度原则的陈毅就被“二月逆流”的风暴刮倒了。1966年末1967年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人都被打倒、关押审查，剩下家族里的妇孺们挺身而出救援他们的丈夫和父亲。

### 新四军女战士

陈毅元帅的另一个儿子陈丹淮和叶飞将军的女儿叶葳葳一起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描述三个新四军女战士一生的经历，其中包括他们各自的母亲张茜和王于畊以及新四军的另一个将领钟期光将军的妻子凌奔。这三位女性都在抗战初期参加中共，以后跟一些新四军的将领结合，育儿生女之外继续革命工作，她们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和充满人格魅力。

1950年代末期钟期光受所谓“错误路线”批判的遭遇，使凌奔比她的女友们更早领悟到党内斗争加剧可能带来的家庭变故。1960年初，她就跟新四军女兵战友王于畊和于玲（新四军干部乔信明之妻）约定将来一旦谁家有难，其他人相互扶持并代为培养孩子。1960年代，钟期光夫妇调至北京中国军事科学院工作。文革开始后，在位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军科院大院里，凌奔带领全家子女为被批斗的丈夫站队，竭力帮助和支援同样被打倒的上级与战友。担任福建省教育厅长的王于畊和她的丈夫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最早被打倒，子女流落四方。凌奔实践当年许下的诺言，不顾阻扰，收留他们在北京读书的两个女儿，以及华东地区各省市第一书记的子女多达19人。这些年轻人有的在北京的大学念书，有的是为躲避风潮，还有的受父母派遣，到北京来打听消息或寻求改善父母处境的办法。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政局松动，王于畊被解除关押，发配到闽北山区的一

<sup>1</sup> 陈丹淮、叶葳葳：《三个新四军女兵的多彩人生：回忆母亲张茜、王于畊、凌奔》，第247页。

家荣军院。她开始跟子女、亲友好频繁地往来，互通消息并制定营救丈夫叶飞的计划。1972年春天她先安排女儿和儿子到北京去，要求探望被关押六年的父亲，得到批准。等到她自己被“解放”，她立即给周恩来写信要求跟丈夫见面，接下去又要求让叶飞住院治病。在北京，王于畊和她的子女们得到陈毅夫人张茜和其他新四军女战友的关怀和帮助，但是她坚持让家人往中南海西门的中央办公厅信访处投书，而不是通过他人转信<sup>1</sup>。新四军女战士们显然非常懂得，如何通过正式与非正式途径为丈夫和家人争取“合法”权益。在周恩来的政府渠道之外，很快又增添了刚刚出任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他可以在一定范围里动用军队资源（例如军队所属的医院），为处于厄运中的原军政大员们缓解困境。不过周、叶的权力限于批准探望、看病或住院。女战士们很快明白，“要想得到‘解放’必须通过毛泽东主席。”

1972年8月邓小平给毛写信，次年春天得以官复原职的例子，启发了无数苦苦等待命运宣判的中共高级干部。在王于畊和张茜的推动下，1973年6月17日叶飞也写信向毛要求解除监护和为党工作。非常幸运，他一周以后即得到毛同意他解放和分配工作的批示。不过即便如此，他还要等一年半，才真正接到新的工作任命<sup>2</sup>。

对于文革时期被打倒的中共高级干部来说，“解放”是最重要的“身份证”，意味开启了一个逐步取得政治身份和与此相联的各种权利的过程：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阅读党的文件，恢复跟级别相联的待遇，分配相当工作等等<sup>3</sup>。

1972年1月当新四军的首领人物陈毅去世时，王于畊曾担心以后丈夫的问题更难解决，设想一旦没有其他出路，带儿女回家乡保定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然而，“九·一三”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以往的权力格局，其他派系的生存空间得以扩大，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出现转机。

<sup>1</sup> 这个联系通道很可能是周恩来和一些高级干部私下约定的，通过递信的方式，使周可以保持跟他们或后者家人的联系。

<sup>2</sup> 陈丹淮、叶葳葳：《三个新四军女兵的多彩人生》，第245—259页。1975年1月，叶飞被任命为交通部部长。

<sup>3</sup> “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阅读党的文件”意味获得党的信任的资格和具有掌握信息的权力。“级别待遇”包括工资和享受工资以外的种种有形或无形的物质待遇，如住房、汽车、医疗、旅行及其交通、住宿等。但是只有“分配工作”才能真正享有职权。

## “子弟兵”和“通讯员”

早期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家庭非常不稳定，抗战开始后随着延安和各地根据地的建立，许多干部结婚（或者重新结婚）生子，开始有稳定和持久的家庭<sup>1</sup>。1940—1950年代是中共高级干部的生育高峰，由于当时缺乏节育观念和避孕手段，并且根据地与中共政权建立后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大多数干部家庭都育有数量众多的子女。文革开始时，这些青少年很多都在大学或中学就读。经过文革最初几个月的风光之后，许多人随着父母被打倒、靠边，开始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卷入”，即为父母的“解放”和复出而奔走活动。原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长子陈小津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一分子，他在回忆录《我的文革岁月》里，对此有非常详尽和生动的描写<sup>2</sup>。

上海是工人造反的发源地和中央文革的大本营，1966年12月末，首当其冲的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发现他自己和家人的安全都可能得不到保障。他决定派长子，上海交通大学三年级学生陈小津（1944.11—）去北京见他的老领导陈毅，通过后者向毛和周恩来汇报上海的情况，同时了解北京的文革形势。几天后，陈丕显又把他的第二个儿子通过军队渠道送离上海，另外又交代妻子说，一旦他出事带孩子们去找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sup>3</sup>。陈小津离

---

<sup>1</sup> 关于早期中共领导的家庭和子女，参见杜魏华、王宜秋编著：《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北京，十届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关于文革时期的高干子女情况，参见石翔编选：《中国高干子女沉浮录》，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抗战以后中共对干部结婚的有关规定，参见南京大学中共党史博物馆网载《二八五七团的结婚政策》一文中的介绍：“在抗战爆发的大背景下，中央结合根据地原有的婚姻法规，适时地对军队、机关、地方的党员干部实行新的结婚标准规定——“二八五七团”。“二八五七团”规定一般是指：军中干部，要求年满二十八岁，五年党龄，七年军龄，团级及以上干部；若是地方、机关党员干部，则要求年满二十八岁，五年党龄，县级、科级及以上干部。……红军到达陕北后，一时之间，瓦窑堡、延安先后出现了结婚热。在瓦窑堡，仅仅1935年12月这一个月，刘少奇、张闻天、董必武、周昆、宋任穷等一大批高级干部便先后结了婚，几乎天天有新人喜结连理，有时甚至一天有几对新人。”  
<http://history.nju.edu.cn/dsbwg/show.php?id=1268&catid=94>，2013年6月13日阅。

<sup>2</sup> 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sup>3</sup> 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第126—127页。不过陈丕显无法想象，军队派系斗争的残酷性远远超过地方。陶勇曾是新四军一师的主要将领之一，以热情豪爽和敢做敢当著称，当时在上海担任东海舰队司令员。但是陶勇的遭际比陈丕显更坏，他和他的妻子1967年就先后突然无故死亡，七个子女全部被赶出家门，分散各处，后来还要依靠陈家和军队将领许世友等人帮助安置。有关陶勇的情况，见该书第159—161页。

开上海第一站先到南京，住在当时的南京军区副司令刘炎家里，刘也是苏中新四军的将领以及陈丕显在上海的老同事。到1967年1月中下旬，刘炎司令家里已经住满了许多老战友、老部下在外地串联的孩子们。在北京，陈小津访问了许多他父亲从前的战友或后来的同事，但是“二月逆流”的发生，使他无法再去拜望陈毅。回到上海后，他发现父母都被关押审查，他本人也曾一度被新的交通大学当局关押和劳动改造，然后被分配到湖南省的一个军垦农场。林彪“九·一三”事件后，他父亲的老战友、江西省的老干部黄知真等人复出<sup>1</sup>。由老干部掌控的江西省被陈小津看成文革中的“解放区”，他先想方设法把自己调到省会南昌的一家工厂，以便借助黄知真的庇护外出为父亲奔波。无独有偶，此时许多被打倒的高级干部子女也纷纷投奔江西“解放区”，或者上学，或者做工，多能得到黄知真的关心、照顾。黄还尽力关照许多下放江西的前中央大员，包括邓小平、陈云、王震、帅孟奇等人<sup>2</sup>。

从1972年春天开始，陈小津频繁地在北京、上海和他的工作所在地江西南昌之间穿梭，探访父亲红军与新四军时期的故旧、友好或同僚，为那些跟他父亲同样失势的长辈们传递消息，一起分析政局变化，寻求适当的时机和途径来解救陷于厄难中的父母。在北京跟陈小津见面最多的长辈是胡耀邦，胡也是陈丕显江西红军时代的老战友。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前，为了凑够开会所需的中央委员之半数，胡耀邦被突击解放，但此后没有给他分配工作。胡长期闲居在家，看书、思考之外，大量跟从各地来看望他的老战友子弟交谈，后者具有他们的父母所缺乏的自由和年轻人的生气。胡耀邦跟他们谈自己对党内历史上的政治运动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同时也为他们出谋划策，让孩子们出面去解救父母。

由于文革派在上海势力强大，陈丕显夫妇从1967年1月开始被长期关押审查。胡跟陈小津先分析了陈丕显被审查的缘由，然后根据北京老干部的家属、子女如何步步为营地争取探视、检查身体、住院治疗、解除监护、分配工作等经验，指点小津第一步先要求跟父

<sup>1</sup> 黄知真跟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等人都是江西红军时期的红小鬼战友，并跟陈、谭两位在新四军共事。

<sup>2</sup> 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第248—253页。

亲见面。这个要求遭到上海“陈丕显专案组”和市委领导人的拒绝。按照胡耀邦的建议，陈小津马上再通过中央委员王震转信给毛泽东，王是一位较早受到毛庇护的将军。1972年8月下旬，陈终于见到分别已久的父母。鉴于上海形势不同于北京，胡建议陈丕显给毛泽东写信，并要陈小津转告其他上海被打倒的老干部同样直接向毛要求看病、住院、学习文件和过组织生活。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文革派与周恩来以及复出的邓小平等人的冲突加剧。前者的干扰很可能影响了毛泽东有关国内外战略的部署，为此受到毛的多次批评。胡耀邦认为此时给毛写信的时机成熟，他向陈小津传授并转告父亲应当如何给毛写信：

“对毛主席老人家，一定要承认错误。两种情况一定要避免：一种情况是无限上纲，把自己批判得狗血淋头，说得一无是处，对这种检讨毛主席也是不喜欢的，会说这不是他本人的检讨，是红卫兵造反派写的检讨。另外一种情况也不要出现，就是什么错误也没有，一贯正确，难道是毛主席错了吗？这种信千万写不得。你一定要告诉你父亲，要表示对毛主席深厚的感情，要表示多年来一直想念毛主席，恳请毛主席给予自己一个改造自己、学习的机会<sup>1</sup>。”

照章办理后，陈丕显果然于1974年11月获准回家。不过，他仍然处于被半监视的状态，既无审查结论也未恢复组织生活和工资。无奈之中，陈只得再次派儿子赴北京向胡耀邦、粟裕等老战友求救。胡看准邓小平受命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日常工作之际，要陈丕显给邓写信。在邓的积极干预下，1975年7月陈得以恢复中断9年的组织生活，随后又获准调往北京，总算逃离了上海文革派的掌控。

1973年中共十大前后，尽管文革派仍然势力强大，但是许多党政军老干部得到解放，不少人还进入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陈小津写到，“在这种形势下，许多还有人身自由的老

<sup>1</sup> 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第354页。

干部都想尽办法解救自己的老战友，耀邦伯伯就是最积极的一个，而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我自然而然介入了这件事。成了耀邦伯伯的‘通讯员’<sup>1</sup>。”陈当然不是唯一为父母亲奔走的“子弟兵”，他经常在各处碰到他的同类们，尤其是在北京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那里长期住着许多部委、省市级的中共高干及其家人，等待“解放”或者分配工作。由于没有分配工作的高级官员不能及时看到文件，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更多的时候，他们需要依靠子女得到高层消息，而这些“子弟兵”们“个个消息灵通，各有各的信息渠道，可以很快地得到中央斗争的情况。”<sup>2</sup>

文革后期，高干子女们大量地卷入高层政治，这种介入出于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由于没有正式、合法渠道，高级干部的家属和子女只能通过故旧友好和以往的上级、战友关系网络来达到目标。而一旦高级干部恢复职权，安排子女或者相互帮助安排子女就是应有之意。在此意义上，文革时期的“身份政治”促使家族和派系势力的兴起。

## 四. 军队的庇护网络

### 保护和监管子弟

军队是中共政权的支柱，也是毛进行文革，试图从乱到治的依赖所在。军队是政治体系中相对独立的一个系统，并且掌握大量的资源。在充满未知数和风险的政治斗争中，它可以为高层家族充当理想的庇护所。中共高级官员的子女（尤其男性），文革前大多选择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清华、北大等名校学习理工科，而不是参军入伍。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回忆录里说，1967年4月叶群让林立果参军，因为学校停课而叶群不愿意他在外边活动，当然进入空军也是为儿子的前程考虑。吴法宪说，空军是技术性较强的兵种，所以许多高级干部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加入空军，毛的侄子毛远新以下，“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刘伯承、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杨成武、许世友、韩先楚、汪东兴、杨德中等许多人

<sup>1</sup> 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第343页。

<sup>2</sup> 陈丹淮、叶葳葳：《三个新四军女兵的多彩人生》，第252页。

的子女和亲属都先后来到空军，空军云集了许多中央和军队领导人的子弟。”<sup>1</sup>

北京集中了大量的军政官员的子女，许多人是文革初期最早的红卫兵及其组织的负责人，受血统论的影响有很强的优越感。但是批判刘邓资产阶级路线以后，老干部和父母纷纷倒台，高干子女开始不满。1966年12月他们中的一些人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公开挑战中央文革，结果被公安部门作为反革命组织镇压，许多成员被逮捕关押。1967年初中央军委与中央文革小组共同制定了有关军队进行文革具体办法的七条规定，毛泽东亲自“再加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这就是1月28日发布的中央军委八条。<sup>2</sup>随后，文革派对“联动”的镇压成为“二月逆流”高层激烈冲突的话题之一。这时陈毅因为卷入“二月政争”被靠边了，他的儿子陈小鲁是文革初期中学红卫兵组织中的活跃分子，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联动”，但是为了避免再影响他的父亲，1967年4月由周恩来出面，把他送去远离北京的军队保护加监管。<sup>3</sup>不久，“联动”分子由毛下令释放，许多人丧失对文革的热情，很可能也受到父母的管束，不少干部子弟就在那时参加了军。在政争尚未分明的时候，军队可以充当各方面的保护伞。

## 开后门当兵

1968年末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以后，军队成为在校中学生最向往的出路，军官们大批地安排自己的子女参军入伍，进入各类军事机构及其军事院校。“九·一三”事件打破了以往一些不成文的禁忌，许多被打倒的军队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另一些热心的高级将领们则义不容辞，利用手中的权力，帮助安排被迫害致死的老战友或者还在靠边站的

<sup>1</sup> 吴法宪：《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第708—709页。

<sup>2</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1967年1月，第39—43页。有关军委八条的制订，“联动”和“二月逆流”的情况，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第442—455页；吴法宪：《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第613—614页；648—649页；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中册，第652—669页。据王力说，毛曾要他与刘涛、贺鹏飞以及其他军队将领的儿子谈话。王书详细叙述了“联动”跟中央文革之间的对立，“联动”被打成反动组织以及1967年4月22日被关押的联动负责人的释放情况。“二月逆流”政治局会议期间，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等人都对“联动”被镇压表示不满。

<sup>3</sup> 陈小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载米鹤都编撰：《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第36—37页。

地方干部的女儿，参军入伍或者上学、进工厂。中国现时著名的党员地产商任志强（1951—）直言不讳地记叙了他走后门当兵的经过。任的父亲原来是新四军五师李先念的部下，文革以前担任商业部副部长。1969年1月任志强跟同学去延安插队，不到一年就在父亲老战友的帮助下到山东济南参军，并在那里碰到近百个跟他同样通过家长关系来参军的年轻人。据任说，这是因为在济南军区、济南空军、山东省军区担任要职的原新四军五师的老战友，经过相互联络，决定共同帮助“被打倒的走资派”的孩子参军。<sup>1</sup>任志强所在的部队属于赫赫大名的原四野38军，曾经历过红军长征和抗战，为此吸引了大批来自不同渠道的“子弟兵”，其中包括，第一，曾在这个军队中战斗过的各级干部，历届军长、师长、团长的孩子。第二，仍在部队任职的将领们利用各种关系将自己的子女送进38军。第三，不在军队任职但与原38军干部有联系者的子女。第四，象任本人那样，家庭虽然跟38军没有历史渊源，但利用父母战友在当地军区的权力，通过征兵正式渠道让他进入38军。除此之外，还有通过征兵交换等方式进入该部队的。在38军，这些人员人数之多号称“三千子弟兵”。不过当兵只是最初的跳板，按照任的说法，提拔是有分别的，一般要有相当出色的表现，尽管军队的子弟要比地方干部子弟更容易得到较快的提拔。<sup>2</sup>任志强解释说，全国出现大批“走后门”当兵的现象曾得到周恩来的默许，目的是保护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后代。实际上，参军和提干很快演变为军队干部的特权与部门利益。在改革开放开辟了其他的社会流动渠道以前，北京与各地部队机构的“大院子弟”通常享受优先参军的权利。在地方上，参军也成为干部的特权，即使在农村基层，也是先照顾各级干部的子弟当兵。开后门的风气很快覆盖其他一切公共部门，一切参军、招生、招工、入党、提拔干部的机会，往往都是先照顾各种有权势或有关系的人。

<sup>1</sup> 任志强：《野心优雅：任志强回忆录》，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61—363页。任非常赞赏军队老战友帮助走资派子女参军的行为。但是他忘记了一点，即他们使用的山东省征兵名额实际上是剥夺其他人尤其是农民子弟的参军机会。人民解放军的兵源主要来自于农村，而当兵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前，农村青年的非常有限的社会流动渠道之一。

<sup>2</sup> 任志强：《野心优雅：任志强回忆录》，第437—438页；第441页；任志强：《我得做我自己》，原载米鹤都编撰：《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二》，第370—371页。

## 军队高层 vs 文革派

1974年初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江青及教育部门的文革派在中央动员大会和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军队干部让子女当兵及上大学、进入外交部门等，公开提出批判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批判的目标明显针对军队将领、复出的老干部，同时影射周恩来，而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首当其冲。此举大有挑起高层新一轮权力之争之嫌，毛似乎很不满意这样的搅局，他批示制止说“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sup>1</sup>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文革派再次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命题，得到毛的首肯，他在一系列讲话中强调说，所谓资产阶级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sup>2</sup>然而毛没有办法说服他的往昔的战友和部下赞同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它进行的方式和它所针对的目标，很难得到老干部和将领们的认同。军队是毛的权力格局中无法绕过的最强悍的集团。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一代军人，不仅相互之间扶持，而且连他们的子女也大批地进入了军队，并且很快就要占据高位。<sup>3</sup>很多人的回忆录里都写到，从1975年10月“反击右倾翻案风”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许多军队高级将领与干部子弟都声称准备一旦局势恶化上山打游击。毛生前一心提拔进政治局的许世友将军，更是扬言要带兵北上，占领北京城。<sup>4</sup>真正可能下决心分裂的军头也许微乎其微，然而他们的声音显然不可忽视，

<sup>1</sup>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批孔到批邓（1972—1976）》，第379—340页。毛还说他自己也走后门，通过谢静宜让浙江文工团的女演员和庐山宾馆的女服务员进北京大学当工农兵学员。有关批林批孔运动的经过及后果，见同书第329—383页。

<sup>2</sup> 同上，第613—618页。

<sup>3</sup> 罗瑞卿是文革以前就被打倒的军队高层人物，文革开始后在医院监护，妻子进监狱，儿子罗宇（1944—）是清华大学学生，也被监押五年之久。“九·一三”事件以后罗瑞卿夫妇先后解除监禁，子女回城，全家团聚。1975年7月在邓小平推动下，毛批准罗和其他一些军队将领担任军委顾问。叶剑英要罗宇参军，得到邓小平批准进总参装备部。此时军队高层的子弟大量进入军队各机构。许多人文革以后成为一些军队重要部门的负责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罗瑞卿担任军委秘书长，罗宇为他承担秘书工作，处理公文并担任跟邓小平的联络工作。见罗宇：《告别总参谋部（罗宇回忆录）》，香港，开放出版社，2015年版。

<sup>4</sup>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第688页。

尤其是最高领袖百年之后。无论文革派还是毛后来竭力扶持的文革以前的中层干部，都将很难对抗具有潜在势力的军队高层将领以及跟他们有历史渊源的地方政治同盟者。

## 结 语

文革以前的党政军的高级官员都是中共各支军队和各个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长期战争的领导人，绝大多数人都服膺毛泽东的权威和英明睿智，高度认同他在夺取政权和重新整合中国中的历史功绩。尽管他们无法理解毛执意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毛很难对这样的高度认同无动于衷，因为这是他们共同开创的历史、共同分享的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跟中共高级官员的关系很象是一个皇帝或是部落酋长与他属下的关系，他掌握着手下一切文武官员的生死大权，丝毫不放松直到去世的那一天。很可能他从来没有打算清除所有跟随他一起打江山的战友与部属，不过他也不准备恢复文革以前的权力格局。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主要运用人事安排大权来实现改造官僚体制的目标。在重新组合的党政军国家机构中，他力图保持一种老、中、青共处，稳健与激进派系并存的权力格局，以保证内政外交的顺利进行和过渡，同时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和方向遭到摒弃。然而，这个蓝图在他去世以前就已经摇摇欲坠了。根本原因在于实现这一宏图的主要砝码，仅仅系在具有家长身份和权力的领袖一个人身上。■

本文系萧小红教授提交给2016年4月在德国科隆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纪念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地方文革史新视野”的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本刊经作者授权刊发。

【考证】

## 榄杆市刀砍红卫兵事件真伪辨

印红标

据红卫兵称：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市崇文区榄杆市发生被抄家的市民李文波刀砍红卫兵的事件，周恩来随后的讲话提到此事。文革结束之后此案重作结论，但未见否定事实的存在。直到文革结束12年后的1998年，美国一家中文刊物发表文章，称刀砍红卫兵之说系红卫兵制造的谎言。<sup>1</sup>有的研究者在真伪难辨的情况下，将“刀砍说”与“谎言说”并重，以日本电影《罗生门》相比，或者进而采信“谎言说”。<sup>2</sup>

榄杆市刀砍红卫兵，是否真有其事？

这一事件对红卫兵暴力的恶性升级具有重要影响，有必要认真考订，以便为历史研究提供坚实的事实基础，避免以讹传讹。本文依据对文献和口述资料的考订，认为：榄杆市确实发生了刀砍红卫兵事件。本文的焦点在于是否发生过刀砍红卫兵事件，至于事件的过程和影响，还需做更多查证，容日后另文阐述。

### 证据之一：内参报道

1966年8月20日之后，红卫兵“破四旧”运动中抄家打人等暴力行为肆虐，官方媒体赞赏红卫兵“破四旧”，却对打人、抄家等暴力行为遮遮掩掩，对打人致死等事更是只字

<sup>1</sup> 鸿冥：《过来人的感想》，原载[美国]《民主中国》1998年第三期，转载于：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专集（三十四）》（1998年5月12日）。

<sup>2</sup> 王友琴：《文革死难者——李文波》（[http://www.199.com/EditText\\_view.action?textId=628119](http://www.199.com/EditText_view.action?textId=628119)）。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0101321773.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0101321773.html)。章立凡：《维权先行者李文波》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7210.html>）。

不提。这种做法，显然是顾虑到这种行为违反中共中央公开倡导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政策，会产生不利运动推进的社会效应，以及负面的国际影响。然而，仅供领导人阅读，不对社会公开的情况通报渠道（或称“内参”）却尽可能及时详细地报道了运动的动态。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辑的《每日快讯》属于这类内参。该刊1966年8月26日报道了公安局汇报的发生在8月23-25日的4起“阶级敌人行凶报复事件”，“8人被砍伤”，包括榄杆市事件：

“8月25日，井岗山中学（女十五中）红卫兵十多人，到崇文区榄杆市10号反革命分子、资本家李文波家里搜翻罪证，进行斗争。下午2时左右，李文波用菜刀砍伤红卫兵3人，街道居民4人（其中1名小孩已死）。李行凶后跳楼自杀身死，其妻刘文秀已被逮捕。”<sup>1</sup>

此为榄杆市事件发生次日的报道，消息来源是北京市公安局。报道中所称一名小孩受伤后死亡，应当是误报。红卫兵传单和报刊及当地居民均说一名儿童受伤，未提死亡。另外，从后文引述的红卫兵资料及现场情况看来，李文波从二层楼跳下不至于立即死亡，更大的可能是跳楼受伤后被群殴致死。

此日《每日快讯》还报称：8月25，北京师大二附中学生曹滨海用刀砍伤了前去他家“进行辩论”的一个红卫兵。

榄杆市李文波刀砍红卫兵和北京师大二附中学生曹滨海刀砍红卫兵，发生在同一天，均为红卫兵抄家的受害者所为。

## 证据之二：中央及北京市领导人涉及榄杆市事件的讲话

榄杆市事件发生之后，红卫兵曾经计划举行万人群众大会，公审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但是经过周恩来劝阻，放弃万人大会，改由法院宣判刘文秀死刑。

<sup>1</sup> 原文“井岗山”照录。

周恩来公开讲话中至少4次提及榄杆市事件。他还力劝红卫兵放弃万人斗争大会，说明中央领导人对此事的重视。北京市领导人讲话也提到此事。

1966年8月27日，周恩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首都红卫兵代表会议上讲话说：“昨天，我们有的红卫兵被坏蛋刺伤了，我们心里很难过，想怎样帮助你们，所以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建立联络站。”<sup>1</sup>周恩来所说的“昨天”应当指25日。26日没有刺伤红卫兵的报道。当时不少领导人在深夜至凌晨接见红卫兵，因而27日凌晨所称“昨天”即指25日。也不排除口误的可能。

9月1日，周恩来对北京市红卫兵代表讲话谈到由榄杆市事件引发一个设想：红卫兵“搜查暗藏的，逃亡的地、富、反、坏、右和反动的资本家时，徒手的解放军、警察远远跟着帮助你们，这是从女十五中的同学被那个反动资本家行凶砍伤后我想到的。”<sup>2</sup>

9月10日，周恩来讲到劝阻红卫兵随意召开万人群众大会时说道：“反革命分子李文波夫妇的公审会我们也做了说服工作。这样的事件我们联络工作做得好不一定发生，要开十万人的公审会，反而扩大他的影响。因这么点事就开个十万人大会，国际影响不好。”<sup>3</sup>

9月25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说道：“像李文波行凶砍人，我们是疏忽的，要是有几个人或者是四个男同学，那他就不敢了。”他还要求红卫兵举行群众大会要经领导同意，再次提到说服红卫兵放弃公审李文波妻子的大会：红卫兵“有一次要公开审判资本家李文波的老婆大会，我把中学的同学找来说，最好把发下的通知收回来，议一议，我正在说服他们，他们说还没有通知，真的把我

<sup>1</sup> 《周总理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27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刊载于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1966年编印，第1集，第8-85页。

<sup>2</sup> 《周总理对北京市红卫兵代表的讲话（1966年9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刊载于前注释文集系列，第2集，1966年编印，第9-4页。

<sup>3</sup> 《周总理在第二次红卫兵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10日），刊载于同上注释文集，第2集，第9-17页。顺便提一句，王友琴在《文革死难者——李文波》一文中说：周恩来在“1966年9月10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外出串连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李文波”。文章在这里似搞错了周恩来讲的场合。周恩来在9月10日至少有两次对红卫兵讲话，在“外出串连誓师大会”上的讲话，未提及李文波。讲到李文波的是在同一天的“第二次红卫兵座谈会”上的讲话。

们弄了个紧张局面。他们知道我要和他们商量，他们没有下通知。”<sup>1</sup>

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 8 月 30 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各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到：“敌人向我们实行了阶级报复，杀了我们八个人”。<sup>2</sup>这里提到的“杀了我们八个人”，很可能是上述《每日快讯》通报中所讲“8 人被砍伤”的口误或者记录者的误记。

上述资料说明，8 月 25 日发生的榄杆市等案件受到中央及北京市的重视，中央直接指导了事件的处理，法院奉命介入。

### 证据之三：红卫兵的宣传报道

榄杆市事件发生之后，红卫兵进行了报道。但当时北京红卫兵还没有报纸和刊物，最初的宣传品是传单。

1966 年 8 月 25 日晚，即事发当天，女十五中等三所学校红卫兵印发题为《告全国革命同志书》的传单，称：

“事情发生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时半左右，在北京红旗区（原崇文区）榄杆市大街旧 9 号。行凶犯李文波和他的老婆由于被斗时极不老实，当时已被女十五中红卫兵看管起来，他们拿出事先磨快藏好的菜刀，先后砍伤了四名‘红五类’同学，一名同院居住的正在洗衣服的老大娘、一名同院居住的正在编篮子妇女和一名少年儿童（三年级学生，在斗争李文波大会上表现非常勇敢坚定）。当即被群众包围，”……李文波“从楼窗跳下，畏罪自杀。他老婆（行凶犯）当场被捕。”

3

这张传单和下述 8 月 30 日传单关于一位小学生都说是被砍伤，而非《每日快讯》

<sup>1</sup> 《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1966 年 9 月 25 日），刊载同前注释文集，第 2 集，第 9-79 页。

<sup>2</sup> 《吴德同志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各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66 年 8 月 30 日），刊载于前注释文集系列，第 1 集，1966 年编印，8-101 页。

<sup>3</sup> 井岗山一中红卫兵（原北京女十五中）、北京工艺美术学校红卫兵、东方红五中红卫兵（原五十九中）：《告全国革命同志书》（传单，抄件），1966 年 8 月 25 日。笔者见到的是张璞先生保存的抄件，原件由北京的王先生收藏。

所称“已死”，应当是《每日快讯》的报道有误。

1966年8月26日0时，即事发之后约10小时，北京女十五中等11所学校和工厂的部分红卫兵联名印发传单《血债要用血来还!!! 一件严重的阶级报复血案》，称：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抄件原文如此，应当是二十四日——引者注）上午十点，北京女十五中初二（四）班红卫兵去榄杆市九号抄同班同学孙洪霞（其父大资本家）家，经街道积极分子揭发，又去抄同院大地主李文波家，抄出皮箱两只，金戒指七只，大批绸缎、布匹、皮大衣。二十六日（抄件原文如此，应当是二十五日——引者注）上午九点，红卫兵斗争地主分子李文波，同院还有两个人陪斗。中午，李文波拿一把长刀砍伤红卫兵……”。<sup>1</sup>

1966年8月30日北京六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一份铅印传单中有这样的文字：

“八月二十五日，发生地主、资本家行凶事件！他们用菜刀，铁棍杀害红卫兵四名（重伤），一名妇女，一个三年级小孩（生命垂危）!!!（详见女十五中材料）”

一年之后，1967年大约8月，一份名为《首都红卫兵》的刊物为纪念8月18日毛泽东检阅红卫兵一周年出版专刊，收录一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以红卫兵流行的英雄事迹通讯报道的文体描述了榄杆市事件。剔除渲染和宣传性的语言，文章提供的事件过程如下。

8月24日北京女十五中的红卫兵小将L、W、R（原文是实名，引者代以字母）等，到榄杆市查抄了“资本家”李文波的家。25日再次到李文波家。中午，在三楼的李文波下楼小便，之后上楼先到厨房拿出菜刀，返回房间时，屋内只有一名红卫兵R。李文波用刀砍向R头顶。R流血。接着，李文波从楼上向楼下跑，接连砍伤红

<sup>1</sup> 井冈山一中（原北京十五中）等11所学校和工厂部分红卫兵署名：《血债要用血来还!!! 一件严重的阶级报复血案》（1966年8月26日0时），由北京机械学院主义红卫兵印发的《首都红卫兵通讯》翻印（传单），据张璞先生保存的抄件。抄件原文中的“二十五日”应当是“二十四日”；“二十六日”应当是“二十五日”。根据可信的资料，刀砍红卫兵事件发生在25日，而不是26日。另外，这份传单（手抄件）结尾处注明的印发时间是：1966年8月26日0时，因此不可能记述26日上午和中午的事情。

卫兵 Li、10 岁的 G 和 70 岁的大娘。红卫兵 L 闻声前去，李文波返身上楼。L 与李文波扭斗并呼喊，她的头部、背部和胳膊被砍。红卫兵 W 接着冲过去，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一手持刀，一手持棍，站在门口。W 抓住刘文秀扭打。很快，其他群众赶来。李文波跳楼身亡。刘文秀被抓。<sup>1</sup>

### 证据之四：被砍红卫兵的回忆

1990 年 11 月，经过朋友介绍，笔者见到榄杆市事件中伤势最重的 L 女士。她在 1966 年是北京女十五中初中二年级学生，1969 年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来回到北京工作。1998、2014 和 2016 年笔者多次向她询问相关细节。

L 回忆了 1966 年榄杆市事件的经历（以下文字为笔者根据口述内容摘编，非口述原文，但保留第一人称）：

8 月 24 日，我们先去一位同班同学（班主席）家抄家，据说她家是小业主（或小资本家）住在楼下。就一间房，又是同学，拉不下面子，进去查看一圈就完事了。

那是一个大杂院，住了很多人家。街道的人介绍情况，说楼上还有一家，主人李文波是资本家、国民党军官，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的确切身份。这时天已经晚了，我们没来得及多查看，就走了。

第二天（8 月 25 日），我们再去那个院子，抄（李文波）家，没有抄出很多的东西，还批斗了那家人。居委会组织的批判，街道老太太发言批判。批斗时有同学用木棍打了老太太，但打得不厉害。我们真正抄家就这一家。

查抄批斗之后，中午大部分人去吃饭了。房间（二楼）里留下一名女生看着李文波夫妻二人。我们三四人去二层上面的顶层小间查看有没有藏东西。大约中午一两点钟，老头儿说要去楼下上厕所，看守的女生让他下去，远远地跟着。老头儿走得很快，

<sup>1</sup> 这份《首都红卫兵》注明编辑部的通讯地址：北京工业学校红卫兵委员会，首都红代会工校东方红；这一期的内容基本是北京市中学生红卫兵的活动，由此推测此刊物由中等学校红卫兵主办。

下楼梯，一会儿又返回来。这家住两间房子，另外还有一间厨房。老头儿过厨房时抄起一把菜刀，就朝那位女学生砍过去。那同学被砍着，喊起来。老头儿又拿着菜刀往楼下跑，砍伤了三位街道的老太太（其中两人是街道积极分子）和一个小孩。

我们听到喊声就往那间房子跑去，一进门，见到只有老太太在。老太太也用刀砍，我们把老太太扭住。我最后一个进屋。这时李文波从楼下跑回房间，正迎上我，举刀就砍。我的头上、肩上被砍好几刀，很重。老太太手里有刀，是被一位同学夺下来的，那同学的手受了伤。

老头儿砍完就跳楼了。听说没摔死，还被送到医院去，但是人们少不了连踢带打。听说很快就死了。老太太被抓起来。听说开了一个很大的公判大会，宣布她死刑。

我的头部和肩部被砍伤，被送进医院，头上和肩上都缝了好几针，还输了血。我在宣武医院住院治疗，因为伤到头部。另外有三个同学（均为女生）也被砍伤。我在医院听说河南也发生了类似砍伤红卫兵的事件。

文革结束之后，李文波的子女要求重新审理此案，相关工作人员来找我调查过。

过去很多年了，一些细节记不准确，但是李文波夫妇确实用刀砍了我们。<sup>1</sup>

## 证据之五：旁观者、当地居民及其他人的记忆

1998年8月6日，笔者路经北京市崇文区榄杆市，向当地居民询问，并有幸拜访事件发生后，曾经送伤者去医院的居民王凤莲。

### （一）当地居民的街谈巷议

笔者去榄杆市的那天傍晚，天很热，询问榄杆市街边几处纳凉的居民。年长者都说知

---

<sup>1</sup> 大约在1998年或1999年，笔者向专注文革暴力的旅美研究者王友琴谈到对榄杆市被砍红卫兵L的访谈。王友琴对于L的口述不屑一顾，并告知：已经有当事人出来坦承，实际上没有发生砍人的事。随后笔者找到了鸿冥的文章，并再向L询问。

道文革之初，这里发生过刀砍红卫兵的事情，知道李文波夫妇一人跳楼后身死，一人被枪决的结局。有几人称当时有一位居民被砍伤，有一人说伤者住老门牌30号，当时住了些日子医院，不过已经过世。那人名叫“任秀女（音）”，当年是街道积极分子，40来岁。市民指路北的一座小楼说，那就是事件发生的地点。

有人说，还有一个孩子（小学生）被砍伤。一位男士称，那男孩是他姐姐的同班同学，叫“谷庆瑞（音）”，属猴的，前几年在一家饭馆工作，“当头儿（负责人）”云云。但是，笔者按照居民指的方向找到一家饭馆，工作人员说没有“谷”姓员工。

老居民都知道，出事后这条街来了满街的红卫兵、学生，示威游行，戒严，下班回家的人要说明自己住在这儿才能通过。他们说，出事后，红卫兵在这条街打死了很多人。一些人能说出崔家有人被打死了，粮店姓杨的被打死了，卖烤白薯姓刘的被打死了等等。只有一位家住127号东隔壁的人坚持说，没有打死人。他说，当天晚上不少红卫兵在他家，屋子呆满了。夜里，打地铺让他们睡觉。

总之居民对于刀砍红卫兵一事多少能说上几句，多为听说，细节上常常众说纷纭，但无人质疑此事是否发生过。

## （二）外围旁观者的证言

能问的都问过了，在笔者准备回家时，一位一直没有说话的60来岁的妇女过来说，她知道当时的情况，请笔者到她家里去谈。

待到那妇人家坐定，她先询问笔者：为什么要打听这件事？做什么研究？又请笔者出示工作证。看上去是街道积极分子，甚至像管点事的样子。后来话说多了，得知她名叫“王凤莲”，63岁，家庭妇女，“没文化”即识字不多，丈夫退休，原来是三轮车夫。

王大妈讲述了如下所见所闻（以下文字是笔者根据口述内容摘编，不是口述原文，但保留第一人称。）：

榄杆市事件的事主叫“李文波”，有点秃顶，戴眼镜，个儿不高，与我住斜对门。

听说是做过国民党军官，文革前也做过街道积极分子，以修理自行车为生，“没见过

什么思想反动的地方”。

文革前，街道就开始搞运动（很可能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者注），对他教育了些日子，集中学习，改造思想一段时间。他表现还好，干活任劳任怨。回来后修理自行车。他“有文化”，高兴了喜欢拉胡琴自己唱，与大伙儿关系还挺好的。

文革开始后，他被批斗，那小楼上下都归他。斗他那天，我们（街道）积极分子轮班看门，怕出事，怕有人趁乱偷拿东西什么的。

红卫兵抄了他家，从楼上往楼下扔东西，挂出来他家的绸布，让居民看。把缝纫机砸了，把老书抄出来。他爱看书。他一定是心疼那些东西了。

红卫兵斗他，打了他，打得不严重。之后，让五六个红卫兵看着他们俩口。李文波上茅房，预谋把刀放茅房。他拿了刀往楼上去，先砍了一个孩子。

我在门外听见有人喊，有印刷厂的人往楼里跑，我也跟着跑进去。就见那妇女肩上被砍了，露着口子，流着血，肩上是一刀还是两刀，记不清楚。我把她救出来，就喊：“砍人了！砍人了！”印刷厂的人拿着救火的家伙什么的往里跑。那妇女喊：“救我的孩子！救我的孩子！”我就安慰说：“（孩子）有人送医院了。”实际我也没看见那孩子。先砍的孩子，孩子的妈见了急了，冲上去，又被砍了。孩子伤得厉害，不知道是谁送到医院去的。

没有汽车，我就拦了一辆三轮车。我这么搂着她（做出姿势），送第四医院。我在医院时，看到受伤的学生也往里送。我送受伤的人去医院，身上也有血迹，肚子那儿都是血嘎巴。那天穿了一件新的竹布色儿汗褙儿（北京方言：竹布色即淡蓝色；“色儿”发音：shai-er；汗褙儿指衬衫），弄上血迹，费挺大劲洗，洗不净。新的衣服，挺可惜的。我爱人是蹬三轮车的，穷呀，买一件的确良衣服不容易。

我那年31岁，还是小媳妇，也不知道害怕。受伤的妇女比我大十多岁，都是街坊。我那会儿对党，对国家特别信任、认真。

大伙儿赶到楼上，那孩子藏在床底下，受重伤。那是邻居孩子，约摸三年级。

这老头儿（李文波）跳楼，不想活了。大伙儿围堵，又把他老婆打了。老头儿没摔死，给弄到第四医院。他不吃不喝，给治腿，他不让治，给输液，他不输。后来死了。把老婆儿弄到区政府，在大街上过，大伙儿打。老太太连打带病，死了（实为被枪毙了——笔者注）。老太太没砍，老头砍了。

红卫兵有五六个人，三个人受伤重。革命小将那个哭啊，到夜里1点才止住。大街上喇叭随时报告，现在革命小将情况怎么样，在医院里的情况怎么样，现在谁谁喝水了，昏迷了，这个那个医院的大夫去了，什么的。

接着，中央、北京市、公安局、各学校来人，由西口到大石桥满戒严。领导人来了，看完走了。走了之后才说某某领导来过。

区里下任务，让各饭铺给红卫兵做饭，红卫兵嗓子都喊哑了。我们给送水，到天亮4点才回家。

游行示威有三天，喊：“还我革命小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喊了三天。

王大妈的陈述主要是亲见亲历，也混杂了听说的内容，二者不难分辨出来。

说到后来，更近乎了，大妈说：她在这儿住了42年，搞街道工作好多年了。她还拿出最近报纸上报道她的文章。一张是1998年7月1日《北京晚报》的短文《好邻居王凤莲》；另一张是1998年6月20日《生活时报》文章《爱操持的王大妈》两篇文章内容差不多，讲王大妈在路上见一老人晕倒，救助并帮那老人回家，以及帮助邻里做好事。

### （三）女十五中校友的回忆

一篇网络文章记述了一位女士的回忆。这位女士坚决反对“鸿冥”关于没有发生刀砍红卫兵的说法。她在1966年就读于女十五中，与前去抄家的学生在同一所学校。她说：那天L她们班的几个初二红卫兵去那个小楼是为了抄一个同班同学的家，这个同学出身资本家，但是没抄出什么成果，后来去抄了李文波家，因为听说这个楼里的几家住户都要向李

文波缴纳房租。小楼是政府盖的，地皮原是李家的平房，合住在小楼里的人家所缴纳的房租由国家房管所和李文波分成，这是当年的房屋政策。在中学红卫兵的头脑中，房产主和资本家没有本质区别。

去李家抄家确实遇到了反抗，李文波将两名红卫兵砍伤，事后她亲眼看到 L 缠满纱布绷带从医院大门出来，头发剃光了，同时受伤的另一个同学，听说手腕的肉都翻过来了。<sup>1</sup>

### 对“谎言说”的解析

以上官方内参、周恩来讲法、红卫兵报道、被砍伤的红卫兵和当地旁观居民的回忆，均称 1966 年 8 月 25 日，红卫兵对榄杆市居民李文波进行抄家的过程中，发生了李文波刀砍红卫兵及居民的事件。与此相反的说法，即称没有发生刀砍红卫兵之事的只有一条资料，即发表在美国出版的中文刊物《民主中国》1998 年第 3 期，署名“鸿冥”的文章《过来人的感想》。这篇长文讲到六、七件文革时期疯狂、荒唐的事情，其中与榄杆市相关的一段这样叙说：

“1966 年秋天十万人齐聚工人体育场，集会声讨崇文门外榄杆市反动资本家砍红卫兵的罪行，此事曾作为红卫兵造反有理的证据，广为传播。十余年后，当年两个红卫兵当事人之一的 S 女士，作为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毕业生，分配来和我共事，由于好奇，我问过她此事始末。

承她坦率告我：‘榄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那时候我们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子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们吓跑了。实际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么，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把

<sup>1</sup> 田小野：《与王友琴面对面》，[http://www.21ccom.net/html/2016/minjian\\_0115/830.html](http://www.21ccom.net/html/2016/minjian_0115/830.html)

他给枪毙了。我在东北生产兵团入党时，如实跟政委说过，他教我别说了，不然别人会说你立场不稳。’”<sup>1</sup>

按照这个说法，榄杆市没有发生被抄家的居民李文波刀砍红卫兵的事，“实际谁也没砍谁”。这与前引诸多文献和口述资料相左。文章是转述 S 的回忆，称 S 是当年两个红卫兵当事人之一。实际上被砍的红卫兵是 4 人，她们的名字共 12 个汉字，均不以 S 打头。

事件在场者除了李家夫妇之外，还有 4 名红卫兵、3-4 位居民。此外，一些工人、医生、公安人员、北京市领导、中央领导（周恩来）、法院都在不同时段，从不同角度有观察或调查，很难想象他们都会随着两三个红卫兵的谎言众口一词。文革结束后，此案重新审理，据说 1981 年法院对李文波判定不予起诉，其妻刘文秀改判无罪，<sup>2</sup>而没有称其为“假案”。就是说，没有否定曾经发生刀砍的说法。

那么这位前红卫兵 S 是谁？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当年参与抄家的是女十五中初二（四）班的学生，互相熟悉。据当事人 L 讲：2014 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战友聚会时再次提到此事。各位同学和知青回忆，这班确有一位并只有一位同学去黑龙江兵团之后被作为工农兵学员选送到清华大学读书，然后被分配在北京工作，她的姓氏拼音以 S 打头。但是，榄杆市事件发生时，这位 S 没有去。这就是说：“鸿冥”文章中以目击者身份进行回忆的 S，事发时并不在场，并非目击者。

如果 S 不在场，为什么要以当事人身份说“谁也没砍谁”呢？在联系到 S 之前，是否可以做这样的推测：误传源自鸿冥的转述。很可能转述者（鸿冥）没有准确掌握口述者的意思或者转述时走样，也不排除讲述者没有表达准确。转述者失真的可能性更大。口述回忆中失真是常见的现象，转述口述内容更容易出现走样。

期待这位 S 女士能够以方便的方式讲出她的真实见闻，以便厘清史实。

<sup>1</sup> 鸿冥：《过来人的感想》，原载[美国]《民主中国》1998年第三期，转载于：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专集（三十四）》（1998年5月12日）。

<sup>2</sup> 王友琴：《文革死难者——李文波》。

## 结 论

第一，榄杆市确实发生过刀砍红卫兵的事件。

1966年8月24和25日，北京女十五中的红卫兵查抄北京市崇文区榄杆市市民李文波的家。25日中午李文波持菜刀砍伤4名红卫兵，以及至少1名居民妇女及1名儿童。事情发生后，李文波跳楼受伤，继而被红卫兵和居民、工人暴打致死，一说被打之后送到医院后死亡。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也被严重殴打，后经法院宣判并执行死刑。文革结束后，法院对此案复查，对刘文秀改判无罪，对李文波不予起诉。

第二，榄杆市事件是居民对红卫兵暴行的正义的暴力反抗。

刀砍事件发生在红卫兵入室查抄的过程中，这种法律批准之外的查抄行为无疑是非法律行径，至刀砍行为发生之时，违法行为仍在实施之中。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当时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政领导、公安部门、法院、街道居民都被组织到一元化的政治体系之中，一概支持、保护红卫兵的行动。完全无助的受害者采取刀砍的行为，是被逼无奈的本能反抗。在红卫兵暴力席卷北京时，反抗必然发生。同一天，北京师大二附中学生刀砍前来抄家的学生，也属于类似的情况。

从建政至文革，重大政治运动一向是党和政府的政策高于被忽视的法律。红卫兵“破四旧”运动受到最高领导当局高度赞赏，其中的所谓“抄家”即红卫兵或“革命群众”自行进入被指控为“牛鬼蛇神”、阶级敌人的居室搜查、毁坏及没收财物，是完全违背法规的，却受到当局的公开认可或默认。文革领导核心原则上主张“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认可抄家，只是要求不要“乱抄家”。

未成年的中学生红卫兵背后是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政治集团，主要责任应当由这个政治集团的决策者负责。

第三，榄杆市事件后，打人狂潮飙升。

暴行引起反抗，反抗招致加倍的报复，这是常见的现象。榄杆市事件之前，红卫兵的暴力已经很严重。事件之后，红卫兵及其他人，采取了更加疯狂的报复行动，肆无忌惮地打人，往死里打，恶性暴力急剧升级。以下两组数字说明了8月25日榄杆市事件之后，北京市打人致死的极端暴力疯狂增长的情况。

据官方内部报道，北京市被打死的人数：8月22日4人<sup>1</sup>，24日18人，25日（午后发生榄杆市事件）66人；26日69人；27日88人。<sup>2</sup>这个数字来自《每日快报》以及《零讯》对前1-4天死亡数字的报道，很不完全，但是从中可以看到8月25日刀砍红卫兵事件之后暴力急剧升级的趋势：25日当天死亡人数比前一天增加267%，次日（26日）比事件发生前一天增长283%，再次日（27日）增长389%。

另据文革后披露的资料，北京市打死人数字：8月24日44人，25日86人，26日125人，27日228人。25日当天死亡人数比前一天增长95%，次日（26日）比事件发生前一天增长184%，再次日（27日）增长418%。<sup>3</sup>

这些血淋淋的数字记录了红卫兵所谓“红八月”的暴行。■

作者附注：衷心感谢为此项考订提供口述回忆的当事人、目击人和知情人，感谢提供资料 and 信息的张璞、魏光奇等朋友。没有这些朋友的贡献，还原历史真相将更为艰难。

2016年8月6日

---

<sup>1</sup> 北京市委办公厅编：《每日快讯》8月23日报道：22日打死4人，其中包括北京外语附中的两位教师张辅仁和张付臻（原文如此，应为张福臻）。据1966年在该校就读的魏光奇和同学回忆，两位老师在8月21日（星期日）被残酷殴打，当晚应当已经死亡，22日（星期一）早上学生到校看到了尸体。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讲述外语附中两位老师被打死于8月19日，日期似有误。

<sup>2</sup> 《每日快讯》8月27日打死69人。《零讯》8月29日报道27日打死79人。《零讯》31日再报：27日打死88人。

<sup>3</sup> 北京市公安局制作的《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北京市打死人情况统计》，1980年批判谢富治的中央第77号文件的附件之十三，第13页。在该文件中，这个“统计”作为附件，是印刷得不清楚的照片，字迹模糊，统计年月不详。

【考证】

## “红八月”北京的暴力峰值时间<sup>1</sup>

范世涛

1966年8月下旬开始，首都红卫兵杀向社会“破四旧”，制造了大量暴力事件，北京沦为“恐惧之城”。在暴力威胁下，北京居民销毁书籍、信件、手稿、照片、证件、画册、唱片，丢弃贵重物品，以应付迫在眉睫的人身安全危机。

关于首都红卫兵在“红八月”暴力行动的严重后果，目前已经有一些统计数字公布出来。但这些数字的范围和定义往往讲得很不清楚，影响了对“红八月”的整体认识。本文将对这些已公开的乱打乱杀数字含义进行初步整理，强调“红八月”北京城乡的暴力模式和暴力峰值时间均有所不同。

### 一. “1772人”的时间和区域范围

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 1949-1978》，1966年8、9月间，北京市被打死的人数共计1772人。<sup>2</sup>

上引“1772人”是一个被广为援引的经典数字。但该数字的时间叙述比较模糊，数据涵盖的范围也不清楚。

其实，《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二卷已经给出了更加准确的时间范围：“全（北京市）从8月5日至9月23日有1772人被打死”。<sup>3</sup>

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卞仲耘书记成为北京第一位被学生打死的中学领导人。所以，从8月5日算起是容易理解的。但9月23日这一截止时间，是因为9月23

<sup>1</sup> 感谢印红标、杜钧福对本文初稿的评论。不当之处，由本文作者负责。

<sup>2</sup>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2001）：《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 1948-1978》，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224页。

<sup>3</sup>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2011）：《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二卷，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362页。

日至9月底并没有人再被打死,还是因为9月23日只是因为加总计算时只收集到截至这一天的数字,现在尚不清楚。如果9月23日至30日,北京没有被打死的人,那么可以简单地说8、9月北京共计1772人被打死;如果23日后还有新增被打死的人,8、9月间被打死的人数就会超过1772人。为稳妥起见,建议以后援引“1772人”这个数字时,明确说明其时间范围是8月5日至9月23日。

“1772人”仅限于北京城区,还是既包括城区也包括郊区农村呢?从上引两书所用的“全市”、“北京市被打死的人数”来判断,这一数字并不仅限于城区,其中也包括郊区农村被打死的人数。

其实,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已经明确指出:“据统计,全市1966年8月5日至9月23日共计打死1772人。其中,京郊农村的大兴、昌平县的一些乡村,出现了大量打死人的事件。”<sup>1</sup>所以,“1772人”既包括北京城区、也包括郊区农村被打死的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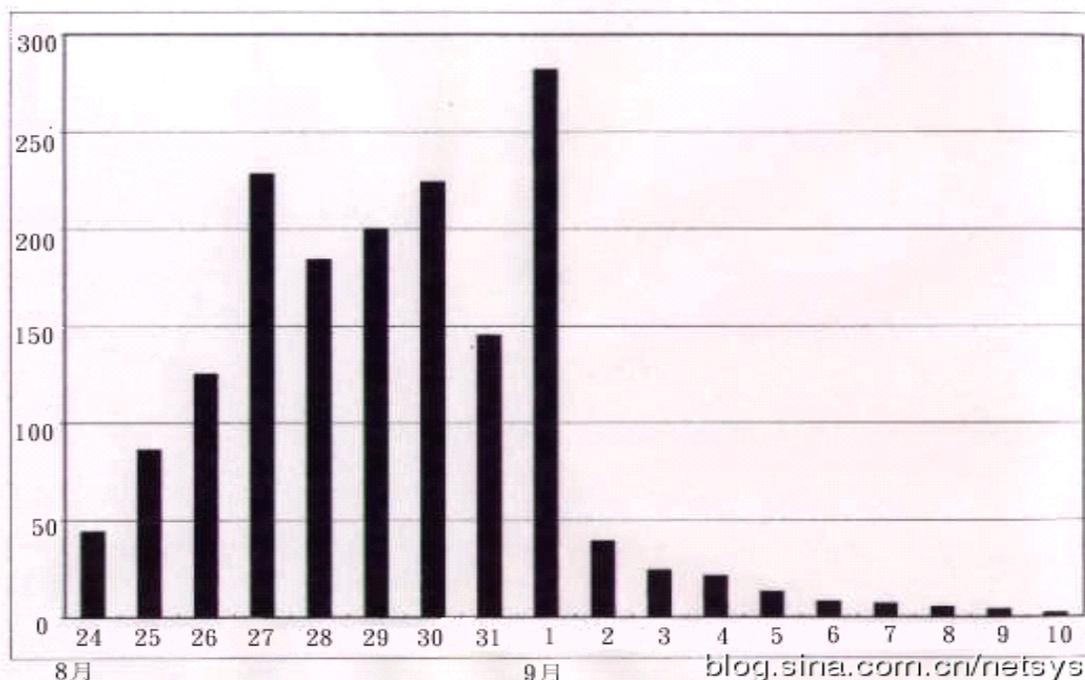
至于全北京被打死的这1772人的死亡时间、区域和身份分布,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详细数字。

## 二. 逐日统计包括农村数字

王友琴女士在《文革受难者》一书中,公开了一份“红八月”北京被打死人数的时间分布资料。具体数字为:8月24日,44人;25日,86人;26日,125人;27日,228人;28日,184人;29日,200人;30日,224人;31日,145人;9月1日,282人;2日,39人;3日,24人;4日,21人;5日,13人;6日,8人;7日,7人;8日,5人;9日,4人;10日,2人;11日以后知道日子的20人。其它时间不详的88人。<sup>2</sup>根据这些逐日统计数字,她还制作了下图:

<sup>1</sup>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2012):《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2012年,人民出版社,第64页。

<sup>2</sup> 王友琴(2004):《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第224页。



来源：王友琴（2009）：《文革死难者——李文波》，见“中国战略与研究会”网<http://www.cssm.org.cn/newsite/view.php?id=28318>；王友琴（2010）：《恐怖的红八月》，载《炎黄春秋》2010年10月。

在上述数字基础上，王友琴提出：1966年8月26日，北京的死亡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8月26日到8月27日，死亡人数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死亡人数达到了最高峰。她认为原因是李文波被打死之时，北京的杀戮规模升级已经成为定势。<sup>1</sup>

王友琴公布的上述数字加总合计 1749 人。这与官方正式公布的 8 月 5 日至 9 月 23 日之间共计 1772 人被打死接近、但不相同，其中有 23 人的数字差距。这种差距的来源不得而知。

王友琴公布的逐日统计数字包括郊区农村数字吗？

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记录，北京“郊区农村打死人现象集中在 8 月 29 日至

<sup>1</sup> 王友琴（2009）：《文革死难者——李文波》，见“中国战略与研究会”网<http://www.cssm.org.cn/newsite/view.php?id=28318>。

9月1日，共打死684人”。<sup>1</sup>如果王友琴公布的数字不包括农村数字，北京市8、9月份的被打死人数至少是1749加684人（2433人），这与1772人的城乡总和数字实在太远。可以判定，王友琴的逐日统计数字其实也是包括郊区农村被打死人数的。

因此，王友琴根据逐日统计判断9月1日前北京暴力升级已成为定势时，是从北京城区和远郊农村被打死人数总和角度说的。

实际上，北京城区和郊区农村的暴力模式和峰值时间均有重要差异。根据总和数字推论9月1日前北京暴力升级已经成为定势的判断并不妥当。

### 三. 郊区农村暴力模式不同于城区

“红八月”北京城区的暴力系首都红卫兵主导，而郊区农村的情况有所不同。对此，官方历史著作已经有比较明确的说明。

根据前面引用过的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 1949-1978》，北京郊区农村打死人现象集中在1966年8月29日至9月1日，共打死684人。<sup>2</sup>这主要集中在昌平和大兴两县。

据昌平区委党史办公室编写的《十年动乱中的昌平》，从1966年8月底至9月上旬，昌平县24个公社中有14个公社打死327人，是文革期间昌平乱打乱杀死亡人数的95.6%。<sup>3</sup>其中最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在中越公社和黑山寨公社。8月27日，中越公社派出所负责人召集会议，布置公社的扫“四旧”，会上宣读和印发了“西城纠察队”“以血偿血，以命抵命”的传单，决定27日全公社统一行动。当晚中越公社的燕丹砖厂借口有人搞反革命暴动，打死4人。28日、30日，公社两次召开电话会议，逐村公布打死人数字，称破“四旧”进展顺利，打死“黑五类”大快人心。在电话会后，回龙观有的人认为落后了，受到

<sup>1</sup>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2001）：《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 1948-1978》，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224页。

<sup>2</sup>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2001）：《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 1949-1978》，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224页。

<sup>3</sup> 昌平区委党史办公室（2002）：《十年动乱中的昌平》，载《内乱的十年——北京区县“文化大革命”时期纪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2002年，第289-290页。

批评，于是连夜行动，在30日一夜打死30余人。此后，打杀之风愈演愈烈。到9月6日止，全中越公社共打死144人。黑山寨公社公安员28日、29日分别到黑山寨、辛庄两村和黑山寨中学游说，称“红卫兵打坏人没事”，“中越公社一个砖厂一夜就打死十几个人”，煽动起乱打乱杀之风。到9月4日止，全黑山寨公社共计打死67人，其中未成年的小孩18人。直到县委派人制止，事态才平息。<sup>1</sup>

大兴县的严重杀人事件发生于8月27日至9月3日。据大兴区史志办公室编写的《“文革”中的大兴》记载：8月26日，负责联系红卫兵的县公安局治安科副科长张某召开河北农大园林化分校（校址在黄村，简称林校）和黄村中学红卫兵负责人以及黄村镇长、黄村派出所民警等9人参加的会议，介绍了27家“四类分子”的情况，并成立了指挥部，划分了战斗组，分工黄村中学负责一、二、三街和高米店，林校负责四、五、六、七街，要求红卫兵统一行动，27日下午3点统一行动。在这次统一行动中，红卫兵当天打死2人。之后张召集红卫兵开会，对杀人的事情只字未提，要他们休息，总结经验教训。而红卫兵将此理解为支持他们继续打下去，28日红卫兵到芦城公社前辛庄大队打死23人。在8月28日这一天，黄村派出所指导员和公社武装部干部还联合召开公社各大队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会议，指导员在会上讲：“四类分子不老实，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为强。”随后，29日黄村公社文革小组决定，组织4个大队红卫兵去打杀李庄子大队“四类分子”。打杀之风进一步蔓延。29日夜天堂河公社辛立村大队打死“四类子女”及家属子女53人。8月30日晚，大辛庄公社召开17个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秘密会议，会上制定了杀人计划，并最后宣誓严守秘密。会议宣布，31日晚10：30统一行动，“拔尖子”还是“一扫光”各大队决定。当夜，全公社17个大队中9个大队杀了人，公社文革副组长亲临现场督战，当夜全公社共杀110人。直到9月1日，市委书记马力来到大

<sup>1</sup> 昌平区委党史办公室（2002）：《十年动乱中的昌平》，载《内乱的十年——北京区县“文化大革命”时期纪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2002年，第289-290页。

兴，向全县做了广播讲话，市、县向乱杀人社队派出工作组，事态才得到基本控制。<sup>1</sup>8月27日至9月1日，全县13个公社和县直属局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324人，22户被杀绝。<sup>2</sup>

在昌平和大兴的惨案中，县公安局或公社、大队干部起了组织领导作用，他们有时借助红卫兵之手，有时借助农民之手。这两个县的暴力打杀模式之所以近似，一个共同原因是这两个县均传达了8月26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包括下述内容的讲话：“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sup>3</sup>这两个县的有关干部将上述讲话看作乱打乱杀的根据。

在前面引述的昌平和大兴党史部门文献中，城区红卫兵组织“西城纠察队”“以血偿血，以命抵命”的传单曾经强化昌平县公安局治安科会议统一行动的决心，在昌平和大兴的乱打乱杀行动中也有郊区农村红卫兵的参与，但总的来说，昌平和大兴的事件中乱打乱杀主要通过正式组织渠道布置和下达任务，红卫兵的作用是辅助性的；而城区的红卫兵行动自主性和分散性要高得多，在暴力事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北京城乡地区红卫兵在“红八月”暴力中的不同作用，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关注和深入讨论。

这里要补充的是，昌平区委党史办公室编写的《十年动乱中的昌平》中提到中越公社派出所8月27日召集的会议上曾经宣读和印发“西城纠察队”“以血偿血，以命抵命”的传单。<sup>4</sup>该传单到底是来自“西纠”总部，还是来自“西纠”成员组织，或者仅仅是误传误记，目前还无法确证。如果该传单确系来自“西纠”总部，那么当事人反复强调“西纠”“讲政策”的叙述需要重新认识。

<sup>1</sup> 大兴区史志办公室（2002）：《“文革”中的大兴》，载《内乱的十年——北京区县“文化大革命”时期纪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2002年，第368-370页。

<sup>2</sup> 北京市大兴区史志办公室（2005）：《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兴区历史大事记（1930-2002）》，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21页。

<sup>3</sup> 同上。

<sup>4</sup> 昌平区委党史办公室（2002）：《十年动乱中的昌平》，载《内乱的十年——北京区县“文化大革命”时期纪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2002年，第289-290页。

#### 四. 城区红卫兵暴力的峰值时间

除了红卫兵在暴力活动中的作用差别，北京城乡地区“红八月”的暴力峰值时间也有所不同。与城区相比，昌平和大兴农村的暴力峰值时间来得晚一些，走得早一些。

全面比较北京城乡“红八月”的暴力峰值时间差异，需要区分城乡的逐日统计数字。这样的数字目前还无法得到。尽管这样，根据农村乱打乱杀现象的具体情况和王友琴公布的数字，仍然可以做出非常粗略的推测。

根据昌平区委党史办公室《十年动乱中的昌平》，该县日期准确的不完整被打死人数字可以罗列如下：8月27日，中越公社燕丹砖厂被打死4人；8月29日，黑山寨公社黑山寨大队2人被打死；30日夜回龙观被打死30余人。<sup>1</sup>这几个数字加起来只有36人，在昌平被打死人中是很小的份额，但都属于非常恶劣的情况。

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大兴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写的《大兴建设史》，可以得到有日期根据的不完整数字。在8月27日下午，黄村镇打死2人；28日芦城公社后辛庄大队打死23人；29日夜天堂河公社辛立村大队打死53人；30日上午天堂河公社马村大队1人被打死；31日夜大辛庄公社杀死110人；9月1日天堂河马村大队打死20多人。<sup>2</sup>这些数合起来为210人以上，占大兴事件被打死人数的三分之二左右。

昌平和大兴的被打死人数量距离不大，在时间上大兴的乱打乱杀现象主要集中在8月27日至9月1日；昌平的对应时间是8月底至9月6日。也就是说，昌平的暴力峰值相比大兴来得更晚，制止得也更晚。

对于王友琴提供包括城乡的逐日统计数字，如果减去前列对应日期两县不完整的被打死人数，可以得到城区被打死的最高限人数：27日，222人；28日，161人；29日147人；30日195人以下；31日35人；9月1日262人以下。这一组数字是不同程度高估的城区

<sup>1</sup> 昌平区委党史办公室《十年动乱中的昌平》，载《内乱的十年——北京区县“文化大革命”时期纪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2002年，第289-290页。

<sup>2</sup>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大兴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2007):《大兴建设史》，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141-144页。

被打死人数最高限。每个数字的高估程度，取决于昌平和大兴已知数字的不完整程度。昌平和大兴的当日数字越不完整，高估就越严重。根据高估程度调整后，就是城区实际的被打死人数。

在上述数字中，9月1日的数字最高，其次是27日，再次是30日和28日。这几个具体数字的高估程度如何呢？

首先，8月27日的数字（222人）高估程度不大，是这几个数字中最接近城区实际被打死人数的数字。原因是无论昌平还是大兴，这一天距传达谢富治讲话时间不长，乱打乱杀尚未大量出现。8月28日乱打乱杀苗头开始扩展，但尚未大面积蔓延，数字（161人）的高估程度也还不那么严重。所以，27日和28日的数字接近城区实际被打死人数，可以看作略为高估的近似值。

其次，9月1日的数字（262人以下）高估程度非常严重。原因是昌平的乱打乱杀致死人数已经进入峰值时间范围。考虑到大兴农村被打死人数的最高值是8月31日的110人，即使9月1日大兴及其他农村地区的被打死人数按照一半来计算，9月1日的高估数字也将高达55人，而对应的城区被打死人数将低于207。这很可能低于8月27日的实际数字。类似的原因，8月30日的数字（195人）也是严重高估的，但高估程度低于9月1日。

如果上述判断成立，北京城区红卫兵暴力的峰值时间应为8月27日而不是9月1日。次峰值时间，可能是9月1日、8月28日，也可能是8月30日。与大兴、昌平相比，城区的暴力开始更早，制止要晚得多。在暴力峰值时间上也早于大兴和昌平。

当然，这是在数据极不充分下所做出的推断。真实情况是否如此，尚有待进一步的数据披露。但笔者对北京“红八月”城区红卫兵暴力的峰值时间为1966年8月27日而不是9月1日颇为自信的。■

2016年5月30日定稿

【广东文革】

## 1966年广州封闭《红卫报》事件

叶曙明

《羊城晚报》是广州三家报纸（《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中，在文革中受冲击最大的一家。广州的文革是从批秦牧开始的，而秦牧曾经担任《羊城晚报》的副总编；中南局最早挨斗的负责人是王匡，他作为中南局的宣传部长，一直分管《羊城晚报》。更重要的一点，陶铸在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期间，对《羊城晚报》，一向格外垂意，呵护备至。因此，当造反派的炮口开始对准陶铸时，《羊城晚报》便不可避免地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

造反派对《羊城晚报》副刊《晚会》“放毒草”作了一个统计，“1960年毒草66篇；1961年毒草28篇，有严重问题的34篇；1962年毒草129篇，有严重问题的69篇。仅三年中，共计毒草223篇，有严重问题的103篇。这些作品中，有攻击党和大跃进和吴晗相呼应、相配合的；有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的；有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有鼓吹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的；有封建主义、封建迷信、低级趣味的”。

对《晚会》的作者，也作了一个统计，“《晚会》作者有150人。调查了110人，其中工农兵仅占4人，占3.7%；教授、讲师、医生、教师和研究生为43人，占39.1%；文史馆人员15人，占13.7%；新闻、电影、文艺工作者22人，机关干部22人，各占20%；无职业的4人。从已查明的40人的政治面目，有反动军官、伪官吏、文人、反动党团骨干共有7人，占40人的17.5%；地、富、反、坏、右共6人，占15%；劳改犯和其他坏分子4人，占10%；被罢官和有其他问题的人15人，占37.5%。以上共占80%。”

按造反派的标准，大凡知识性、趣味性、文艺性、多样性、地方性，都是抹杀阶级斗

争的普遍性和复杂性。任何生活情趣、娱乐、消闲，甚至生活常识，都有可能成为“毒草”，诸如《薛觉先生活二三事》、《红线女温泉游泳》、《元代女艺人朱廉秀的知心朋友是谁》、《大象结婚》、《邮寄外甥女》、《五位幼女成了小天使》、《满塘彩色写金鱼》、《畅谈养生之道》之类，统统属于“无聊之极，庸俗之极，长期腐蚀广大群众”的毒草。而作者除了工农兵之外，其他全部是有问题的。

造反派认为，“不仅《晚会》上毒草大量出笼，其它专栏也是如此，如《五层楼下》，比晚会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罪证之一，就是香港报刊多次转载过它的文章。“仅仅《五层楼下》一栏，被香港反动报刊《晶报》等转载的就有160多条，三万余言，有的还是只字不改全文刊载，成了香港的分店。香港最反动的《星岛日报》专门辟个‘羊城怪现象’专栏来转载《五层楼下》的黑文，仅1963年3月到1964年7月的10多个月中就转载了7.8万多字”。<sup>1</sup>

《广州日报》原来是从《羊城晚报》分出去的，为了保住《羊城晚报》，陶铸在1966年8月曾建议把两报重新合并，改名为《广州晚报》。但事实上，要合也不易。从7月开始，羊城晚报社内部，已经一片混乱。在贴出的1335张大字报中，六成以上是群众之间互相攻讦，43%的报社职工被贴了大字报。当时，报社的“老晚报”（指1964年7月以前在羊城晚报社工作的）一般编辑、记者有37名，其中33名上了大字报。人们哄传报社里“有一个20多人的反革命集团”，以致人人自危。

8月底，广州日报社的部分群众，贴出了炮打萧洪达（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丁希凌（中南局宣传部秘书长、羊城晚报社党委第一书记、社长）的大字报，导致两社的干部群众严重分裂，双方分庭对垒，激烈辩论，甚至爆发冲突，矛盾十分尖锐。

9月1日，《羊城晚报》宣布“接受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意见，经上级批准”，改名为《红卫报》。但围绕着报纸的各种矛盾纷争，丝毫没有缓和。矛盾的焦点之一，在所谓的“黄伟经事件”上。这也是后来红卫兵封闭《红卫报》的主要理由之一。支持封报的“封报派”

<sup>1</sup> 武汉工学院东方红陶铸专案小组编《陶铸问题专集》（1），1967年2月。

和反对封报的“反封派”，对这一事件，各执一词。

“封报派”称：

黄伟经（出身贫农、党员）在运动的第二阶段首先贴了工作队和党委当权派萧洪达、丁希凌的大字报，并串连几个革命同志写信给中南局和毛主席，就因为这样，黄伟经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其原因是：一、搞地下串连，组织反革命集团。二、反对工作组。三、反对党委。当然，把黄伟经打成反革命分子后，工作组还去搜集了不少“理由”，就这样，黄伟经被公安厅抄家，本人被突然扣留，隔离停职反省。他被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小房子里长达四个月。吃饭由人送，报纸不让看，大小便也得受监视。<sup>1</sup>

“反封派”则称：

1. 黄伟经何许人也？

他是《红卫报》经济部副主任（中层骨干），中共正式党员。在运动中，群众揭发他的大字报多达167张。据调查他是王匡、杨奇（羊城晚报总编辑——引注）、秦牧、何军等人的忠实走卒，被列为《红卫报》的八大尖子之一。像这样的人算不算革命群众或一般的干部？

2. 黄伟经的主要问题：据我们向有关部门和群众调查，悉知：他和苏修分子格里曼（该人系苏联工程师，极力吹捧赫鲁晓夫、吹嘘二十大、反对莫洛托夫，谩骂中国妇女代表团）通信长达九年之久，没有向组织反映，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被揭出来，他还经常向苏修索取文章准备翻译……

黄出国访问归来后，给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二联驻穗办事处的人作报告，还在前《羊城晚报》发表两篇文章，严重地泄露了国家机密，××领导机关曾就此案作了追查。类似泄密现象非止这些，由于关系到国家秘密，我们不便在此多谈。仅从这点黄早就构成

<sup>1</sup> 《坚决改组〈红卫报〉！彻底清算前〈羊城晚报〉的滔天罪行！》（传单）

犯罪。难道公安机关对这样的人施以专政还有什么过错吗？<sup>1</sup>

中南局和报社党委都认为黄伟经有严重问题，最初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中南局一位宣传部副部长甚至不容置疑地说：“如果黄伟经不是反革命，我就是反革命。”中南局书记吴芝圃11月在对工作组的一次指示中，明确地说：“黄是政治扒手。”在11月1日的报社党委会上，也有人提出：“黄的问题没有（搞）错，但根据三条定‘现行反革命’不对，摘这个帽子，从（重）新带（戴）修正主义分子帽子。”<sup>2</sup>

然而，仅仅因为内部对处理一个干部有分歧，还不足以构成封报的主要理由。造反派对《红卫报》的一项重要指控是：该报在1966年1月和4月两次刊登同一篇文章《韶山的节日》，作者周立波，即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作者。这篇文章记述了毛泽东回故乡韶山的情景，被红卫兵认定是“丑化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毒草”。问题严重了。

文章是如何“丑化”毛泽东的呢？

周立波的文章在记述毛泽东回乡扫墓时是这么写的：毛泽东用一截松枝插在父母坟前说：不管三七二十一，鞠个躬吧。这“不管三七二十一”可以有多种解释，引起了一些批评，湖南韶山“毛泽东旧居陈列馆”的工作人员写信给湖南省委，指文章“许多细节不确”，“根本就不应该在报上公开发表”。张春桥在看到文章后，打电话给中宣部，认为该文“是歪曲毛主席形象，攻击毛主席”的大毒草，“因为这是一篇不能或不便批评的文章，全国一登就麻烦了”，他要求全国报刊不得转载。2月2日，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不能转载《韶山的节日》。

陶铸派萧殷核实情况，随后以报社名义写信给湖南省委宣传部，要求修改后重新刊登。周立波也通过湖南省委寄来了修改稿和更正启事。《羊城晚报》事先请示了中央，得到“可以由你们自己处理”的答复后，为了避免误解，还把原文中“不管三七二十一”那句删掉

<sup>1</sup> 红卫兵暨南大学八·二八战斗队《〈红卫报〉的命运必须由中南地区广大的工农兵和革命群众决定》，1966年12月18日。

<sup>2</sup> 《红卫报》韶山红军《中南局在红卫报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年2月12日。

了，才在4月23日第二次发表。

张春桥给康生写信提问：“为什么要重新发表，重新肯定，而且打着‘多方核对’的招牌攻击毛主席？……我的政治经验不够，对中南的情况也不了解，请你考虑怎么办？”<sup>1</sup>

康生办公室派了两名《解放军报》记者到广州调查此事。张春桥也写了信给中南局，提出《韶山的节日》是“丑化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毒草”，曾经通知全国各报刊不许转载，不知为什么广东又重登一次？到5月份，羊城晚报社党委向中南局提交关于《韶山的节日》检查报告。就在当天，中南局通知羊城晚报社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在造反派对《红卫报》的一系列指控中，包括今年（1966年）“直至6月6日到7月的一个月里，就有15天没有刊登毛主席语录”；另外一项罪名，今年3月间，以“二盏路灯”为题，刊登了暴露性报道，“以广州一条小街缺路灯为名，恶毒地攻击我们党的干部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造反派声称报社的当权派“大部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蛋”。

在一份题为《坚决改组〈红卫报〉！彻底清算前〈羊城晚报〉的滔天罪行》的传单里，七个红卫兵组织（其中两个是外地的）联名质疑《红卫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从今年5月至现在，半年来羊城晚报对整个中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不推动不促进，除发表过一篇社论，‘向英雄的红卫兵致敬！’之外，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评论、社论。以10月份为例，10月2日《红卫报》转载了《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以后，这一个月里，仅仅在六条消息中简单提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句话，根本不报道、不宣传中南地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好形势。”<sup>2</sup>

北方来的红卫兵，早就想封掉《红卫报》了，迟迟不动手的原因，是怎么评价陶铸的问题。因陶铸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免有些投鼠忌器。12月10日前后，《红卫报》一位美术编辑贴了一张大字报，引起报社内部的争论，《红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这位美术编辑，被造反派认为是“把矛头指向群众”，于是，要求封报的声音

<sup>1</sup> 载广州红司暨南大学《东方红》文艺批判专刊（2），1967年7月22日。

<sup>2</sup> 广东省委批转群众来访接待站“关于群众来信反映的主要情况和问题的报告”，1966年12月18日。

又高涨起来。从北方南下的一批红卫兵在中南局的珠影东方红联络站碰头，讨论封报问题。中大数力系学生、中大八三一组织的头头黄意坚也参加了讨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红卫报》是1966年12月中旬被封的，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省市级的报刊，均已被封，或沦为只准转载新华社讯的境地，而广东三大党报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冲击，应是一个特例。因此，外地来穗的学生，早就想“封”了，这是事实。之所以没有动手，还是一个如何评价广东省委的问题，陶当时上调北京，成为中央的第四号人物，广东一直是陶领导的，因此，广东省委应是“可靠”的。故外地学生虽欲动，但并不敢动。

而封报的直接原因，据我所知，是12月10日左右，《红卫报》美术编辑刘晓兵在单位贴了一张大字报，引起保守派的围攻，而隔了一二天，《红卫报》发了一篇文章，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刘晓兵，而当时正值批资反线高潮，资反线的要害是把斗争指向群众，于是乎，引起外地学生的愤怒，恰好这批人都到了珠影东方红设在中南局的联络站串联，而我那天也恰好在那里与孙效林、刘炳亮等闲聊，谈及此事，武汉南下代表团的人提出把《红卫报》封了，却马上又碰到原先的问题——如何评价陶铸。其中，北京地院东方红的一个学生提出，自66年之后，《红卫报》的前身《羊城晚报》发表了六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六论“高举”），说这六论高举，在全国影响很大，他问广东的同志如何看。在场似乎只有我和刘炳亮（珠影东方红公社成员——引注）是广东人，我只好谈了我的看法，我说，“六论”是《二十三条》毛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后出笼的，所以“六论”只能说明当时《羊城晚报》的当权者从陶那里得到什么消息，而匆忙炮制出来的，目的有可能是为了掩盖他们反毛的本质，因此，若要批《红卫报》，这“六论”倒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至于批《红卫报》与反陶铸我认为不是一回事，这和《人民日报》被改组，不等于反毛一样。这样大家便决定封报。<sup>1</sup>

<sup>1</sup> 《黄意坚回忆录》（未刊稿）。

社会上曾经流传着一个说法，说封《红卫报》是有幕后黑手，是北京林杰在操纵，黄意坚否定了这种说法，他声称：

11月份串连回来以后，就是封《红卫报》了。封的理由实际上就是整陶铸。按毛泽东说要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广东的当权派就是陶铸。如果陶铸在中央是毛泽东信任的，那就是没得搞，广东不用搞文化革命了。反封《红卫报》的人对毛泽东还相当信任，陶铸能做第四把手了，如果不是信任，怎么会做第四把手？……封《红卫报》本来没说封不封的，当时八·三一派一个代表，是化学系二年级的学生（参加辩论），“封！”就封了。我也不清楚里面是怎么辩论的，“别跟他们辩啥子了，把他们封掉算了！”就这句“封掉算了”，就封了。我认为封《红卫报》是一种思潮，不应该有任何黑手操纵，不是后来你们说的是什么《红旗》杂志的林杰，没那回事，根本不存在中央文革的人来指使。<sup>1</sup>

此前，红卫兵已经封了《解放日报》和《湖北日报》，现在终于轮到《红卫报》了。

12月13日，由“武汉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穗联络站”领衔，24个广东和外地的群众组织，包括“中山大学八三一红卫兵”、“中山大学一一七战斗队”、“华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旗红卫兵总部”、“革命造反第四野战军广州地区联合造反兵团”、“珠影东方红公社”、“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穗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穗联络站”、“驻《红卫报》南下革命造反团”等，联合发出封闭和接管《红卫报》的通令：

- 一、封报期间，《红卫报》暂时由工人、红卫兵和革命干部接管；
- 二、封报期间，不准以任何借口，调离该单位的一切工人、行政干部和记者的工作岗位；
- 三、封报期间，不准以任何借口把当权派调走，回避运动，逃避斗争；

<sup>1</sup> 叶曙明访问黄意坚谈话记录。2003年2月23日。

四、封报期间，一切工作人员的工资照发；

五、必须彻底改组《红卫报》报社，在未改组以前，不准以任何借口擅自复刊、迁移；

六、封报期间，原《红卫报》的订户问题由中南局负责处理；

七、以上各条，必须遵守，如有违抗，所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全部由中南局和广东省委负责。<sup>1</sup>

这些群众组织在当天下午2时30分发表《就〈红卫报〉（前〈羊城晚报〉）被封告中南地区革命人民书》：“我们今天封闭旧《红卫报》，宣判它的死刑，就是为广大革命同志明天能够看到真正宣传、传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红卫报》，看到真正起到教育人民群众，组织和鼓舞人民群众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英勇斗争的新《红卫报》。”

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金明首先作了书面表态：“我只代表我个人支持革命同学和红卫兵们封闭红卫报的革命行动。”同时，他向报社作出三点指示：一、报社职工要支持封闭《红卫报》的行动；二、封闭期间，工资照发；三、职工们要等待分配工作。12月15日，中南局宣传部正式发出了停刊通知。

一石激起千重浪。封闭《红卫报》的行动，迅速导致群众组织严重分裂。一部分热烈支持，而另一部分则强烈反对。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大专院校总部（地总）、广州发电厂红旗战斗队、广州重型机器厂红色战斗兵团、广州红江织布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广州纺织机械厂红色工人战斗兵团、珠江电影制片厂工人赤卫队，联络广东省气象局、广东省电业局、广州市果品公司和一大批大、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联合组成了“中南地区反对封闭、停刊《红卫报》联络总部”。

多年之后，广州电机厂工人、广州工人组织“红色工人广州总部”（红总）的头头梁锦棠（文革后期，他担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和第十届中央委员）在接受叶曙明的访谈时，谈及封闭《红卫报》事件。

<sup>1</sup> 《封〈红卫报〉通令》，1966年12月13日。

梁锦棠：封《红卫报》那天我刚好经过《红卫报》，那天我们工厂休息，当时我还想：如果我手下有人，怎么也不会让你封。

叶曙明：事先你们不知道要封报吗？

梁锦棠：不知道。我们是工人，他们是学生。我站在那儿看，心还想着如果我带队人来，怎么也不让你封。谁知第二天回到厂，在厂的传达室，工人已经吵吵嚷嚷了，他们见我就说：梁师傅你来看看这通知！他们指着那张中南局的通知。中南局有个通知，是金明签字的。

叶曙明：金明是支持封的吧？

梁锦棠：（学生）逼着他说封得好，封得妙，封得呱呱叫。另外，我们最不服气的，就是中南局的那个封报通知，说《红卫报》过去办不好，现在办不好，将来也办不好。问题在第三句。“过去办不好”，还可以高姿态讲；“现在办不好”也可以说，现在办得还是不满意；“将来也办不好”，我们就不服气了。按照毛泽东思想来说，事物是发展的，它不对可以批判，怎么能说将来也办不好呢？有什么理由？这不合逻辑。我们工人就吵起来了。

叶曙明：那个通知是怎么下来的？

梁锦棠：鬼知道，是贴在传达室门口那儿的。我们面对中大，有什么事中大都会“照顾”我们，所谓“照顾”，实际上就是想插入我们（工厂）。<sup>1</sup>

在另一次访谈中，梁锦棠追述了他们到报社与封报派对峙的经过，他说：

大家都说（中南局的）决定是不对的。我说：“这样吧，等会我们开个会吧。”（大家说）好啊，等会开个会。工人就说好，去开会。我回到办公室，办公室的人问怎么办？我说找些人来开会。这几天也有些其他厂的人来到我们这里，约上他们来这里，一起开个会，

<sup>1</sup> 叶曙明访问梁锦棠谈话记录。2002年10月18日。

一起研究。结果“哗啦啦”我都不知有多少人，不知从哪里来的，在我们厂里开会。（大家说）我们坚决反封。（我说）好啊，坚决反封。散会后，（有人说，现在）有些反封《红卫报》的人正在去那儿，我们去不去？我说：“去吧！下了班就去。”下班后，把工人叫上14路车（公共汽车），载我们去。一车车的人去反封。那晚在《红卫报》搞到下半夜。<sup>1</sup>

封报后，丰宁路的红卫报社门外，人山人海，两派群众在马路上展开激烈辩论，大标语和大字报已经贴满墙壁。工人们反对封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觉得封报是以北方红卫兵为主，这些人目空一切，气焰薰天，有包办革命之嫌，令人反感。

广州市部分工人、学生组织起“扫流寇队”、“劝架队”，专门攻击北方红卫兵。封报事件发生后，一些造反组织更喊出“赶走北京人，打死武汉人”、“捞松捞松，生在湖南，死在广东”（“捞松”是广东人对北方人的戏谑称呼）的口号。

12月6日，当一群上海红卫兵在龙津东路“破四旧”时，被大批广州市民包围，并一直追到接待站，人群狂呼着“我们广东人联合起来，打死外地人”、“打倒北方串连学生”，用石块砸门，往接待站里冲。来不及躲避的外地红卫兵，几乎全部遭到殴打。

次日晚上，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驻穗联络站与赵紫阳见面，向他提出抗议。双方正在开会，丰宁路红卫报社门口，又聚集了两三千广州市民，驱赶外地学生。据当时和赵紫阳开会的武汉红卫兵说：

我联络站同志闻讯后立即打电话通知中南局和广东省委，请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金明和省委赵明一同坐宣传车赶到现场，这时现场的人数越来越多……一些身份不明的人纷纷爬上宣传车，车的前身和后尾都坐满了人。他们隔着帆布狠狠打我们的广播员，这些暴徒切断了我们的广播线，随后又强行撕开了帆布棚，狠狠地乱打我们的广播员……这时金明同志也挨了一拳……我联络站与赵紫阳的会谈进行不下去了，于是同他一起坐车一同前往现

<sup>1</sup> 叶曙明访问梁锦棠谈话记录。2014年11月10日。

场调查，谁知我们的人一下车便遭到围攻和毒打。<sup>1</sup>

12月23日，一份题为《就〈红卫报〉被封和停刊事件，告中南地区人民书》的传单，在社会上广为散发。传单指出，“《红卫报》拥有37万多订户和成千上万的读者，封闭者无视广大革命群众迫切需要通过党报倾听党中央的指示，倾听毛主席的声音，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大事，文化大革命的大事，单方面地悍然强行封闭《红卫报》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传单提出六项主张：

一、最坚决要求《红卫报》必须立即启封和复刊。

二、一切革命群众必须全面地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中南局某些人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利用《红卫报》被封闭事件所玩弄的阴谋诡计。

三、中南局必须充分考虑广大革命群众强烈反对封闭《红卫报》和坚决要求启封、复刊《红卫报》的革命呼声，立即收回中南局宣传部12月15日的错误通知，并责成中南局宣传部向中南地区革命群众彻底检查自己的错误。

四、复刊后的《红卫报》必须彻底清除前《羊城晚报》错误路线的影响，切实改正《红卫报》的缺点和错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办成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报纸。

五、《红卫报》领导班子存在的问题，必须通过报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依靠革命群众，按照十六条去解决。

六、所有革命群众都应当关心、爱护、支持和监督党报。党的宣传工具《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及党中央批准的其他报刊、电台等，绝不允许任何人肆意封闭、干扰和中断它的正常活动。

---

<sup>1</sup> 武汉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穗联络站《严重的政治事件》，1966年12月10日。

文革以来，广州地区成立的不计其数的群众组织，从封闭《红卫报》事件开始，逐渐分裂成两大派，并出现跨行业、跨地区的趋势。这一事件，对广州局势的影响，至为巨大。由于在群众组织中，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正如黄意坚所说：“事实上，1966年底，中大“八·三一”经11月9日以后在全市（甚至到广州市外）搞冲机要室，抢黑材料，也已疲倦了，而按当时“八·三一”勤务组的观点，是希望（通过）冲要室来发动群众，但其效果，不及封《红卫报》事件，《红卫报》一封，广州明显分成革保两派，对封与不封的辩论，遍及广州全市各个角落。”<sup>1</sup>

12月21日，广州重型机器厂、广州氮肥厂、广东麻袋厂、卷烟总厂、珠江造纸厂、广东电影机械厂、广州市建筑一公司、白云山农场机械厂等24个单位的工人代表，召开座谈会，对封闭《红卫报》事件，展开激烈辩论。省电影机械厂的青年工人莫超海（文革后期担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是“反封派”代表之一。他力言产业工人应该打破以往的沉静，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中去。

在封报之前，已经有许多工人在酝酿成立组织了，封报事件一出，就像点燃了一根导火索，工人组织呈井喷状冒出。莫超海和广州市建筑陶瓷厂职工黄秀琨（文革中地总宣传部、参谋部负责人）接受叶曙明的访谈，谈及封闭《红卫报》对工人组织出现的影响。

叶曙明：是谁提出要搞产业工人组织的？

莫超海：就是大专院校的校工……应该是原来中山医、广州中医学院（的人），我为什么会和他们挂上钩呢？因为我本身搞社会活动比较多，他们有的人是搞环形供电时候的电工，这班人统统都参加了组织。还有一些是参加过广州市工人话剧团的，我曾经是广州市工人话剧团的业余演员，也参加过合唱团，也搞过环形供电，比较熟悉社会上的人，所以单位就推我出来，和他们接触联系。那批人都是学校的司机、水电工、实验工厂的师傅，他们组成了大专院校工人赤卫队。

<sup>1</sup> 《黄意坚回忆录》（未刊稿）。

叶曙明：那时划分成造反派和保守派了吗？

莫超海：还没有。社会上真正划分是从《红卫报》（事件）开始。广州市的工厂还没有正式的名堂，但已经有一些战斗队组织了。

叶曙明：当时成立这些组织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成立一个组织？

莫超海：当时就是为了参加革命大批判，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维护毛泽东思想。大家都说自己是维护无产阶级政权，就要打倒一切。说这个是革命派，那个不是革命派。实际上都是在单位里对领导班子的看法，进而对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在本单位里就是支持哪一批干部，对工程技术人员、对领导个人的看法，慢慢就分成不同的观点。这时就出现《红卫报》事件了。

我8月份出来了，经过几个月，到处联系、看大字报，大家的思想慢慢比较接近了。当时要筹备成立一个广州地区产业工人的组织，大家就推我出来联系……开始筹建（工人组织）这件事时，《红卫报》已经被封了。我们就围绕着对《红卫报》的看法，大家对这件事作一个交流，凡是认为封《红卫报》不对的，不支持，反对的，就把这种思想的人凑过来。

叶曙明：你们是反对封《红卫报》的？

莫超海：我们是反对的。后来说我们这些大老保，就是靠反封《红卫报》起家的。现在看也不是没有道理。

黄秀琨：我们同情文化界、学生，反对封《红卫报》，从思想分界线就是这样。当时我们工人并没有介入，主要是同情文化界和学生。我们的思想就是拥护共产党，你把党报封了，就不太对了。但我们没有参加那些行动，思想和行动要分开。<sup>1</sup>

梁锦棠是红总的发起人与主要负责人。他认为封闭《红卫报》是刺激他们组织工人队伍的重要催化剂。梁锦棠说：

<sup>1</sup> 叶曙明访问莫超海、黄秀琨谈话记录。1997年11月。

到11月份，中央下发了工人“抓革命，促生产”十条下来，可以组织工人队伍、工人组织了，但不能跨行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自然而然就组织起来了。一组织起来，真是好像急风暴雨，很快的，我们新港线那一带的工厂，轰的一下就串起来了，很快的，真是很快、很快，在反封《红卫报》之前，我到了广重、广纸、机械厂……

新港线是我们的策源地。当时我们的指导思想，一是不搞跨行业，另一个是不想搞跨地区。我都不知道你是何方神圣，怎么和你一起呀？弄得不好，给别人戴了一项反革命的帽子我都不知道。这个我很清楚，所以我开第一次正式筹备会时，每一个到会的人都要填一份表，姓名，性别，什么单位，家庭出身，政治面目，担任什么职务，一定要写清楚。

叶曙明：第一次筹备会是几时开？

梁锦棠：66年10月开第一次筹备会。

叶曙明：有多少人参加？

梁锦棠：应该大概三十人左右，在华南缝纫机厂。为什么要到华南缝纫机厂呢？因为我们那个厂，中大和北师大的人已经来了，我在厂里已经给人贴了满天的贴大字报，我的比党委书记的还多，说我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保皇派”，十大罪状，又要炮轰，又要油炸。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在厂里，不是工人写的，是中大和北师大的那些学生写的。他这边贴，我们的工人那边就去撕，这就产生摩擦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在华南缝纫机厂开筹备会。

反封《红卫报》之前，中大有有人找过我，我当时说，你们是学生，我们是工人，如果学生的革命行动大方向是对的，我们工人阶级一定支持。我是这样模棱两可，没有说支持你这支队伍。到《红卫报》被封后他们又来找我，他们知道我们是反封的。我很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的观点与你们不一样，很难谈得下去。当时我是很明确的。这样，厂里的另一班人就与他们结合了，这是少部分人，这部分人不敢与我正面碰撞，因为一和我碰撞，肯定会被大家包围，根本没得拼。所以他们正面不碰撞我，找些学生，甚至走到车间去贴，

走到我的车间、我的老巢去贴。车间的工人就说：你贴呀，你再贴我就揍你，赶你出门口。你再贴！你快点走！我看这种情况，就去华南缝纫机厂，在华南东那里，开筹备会确定成立自己的工人组织，参加中南地区联络总指挥部。

叶曙明：第一次筹备会，你是召集人？

梁锦棠：是的，我是召集人，从在电机厂开座谈会开始，我自始至终都是召集人。<sup>1</sup>

广州代理第一书记焦林义在回顾历史时，也认为封报事件是广州地区文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焦林义说：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以为只是在文化系统，所以市委成立了一个文革领导小组，由管文教的书记薄怀奇当组长，我们那时是不管这些事的，当然作为市委来讲，总的还是要讨论，要研究，但具体的事情由他来管。后来到大串连开始以后，那就不光是文教系统了，整个单位都动员起来了，从省委到市委，整个单位来管了。

从开始批“三家村”，批《海瑞罢官》，那时还局限于文教系统，后来，特别是8月以后，北方红卫兵南下来串连以后，已经扩大到工厂，扩大到农村，领导小组已经领导不了了。省委也好，市委也好，都不能不直接抓了。那个领导小组无形中就撤销了，不起作用了。全部由省委直接抓。

广州真正形成两派，是从查封《羊城晚报》开始的。那时候一个要封，一个不让封，就这么形成两派。以后一派“革命”更厉害一点，一派比较温和一点，就是所谓“保守派”。两派一搞起来以后，地方实际上就管不了了，那就要军队插手了。<sup>2</sup>

时任广州军区司令部秘书科科长迟泽厚（文革时担任省军管会办公室副主任、省革

<sup>1</sup> 叶曙明访问梁锦棠谈话记录。2002年10月18日。

<sup>2</sup> 叶曙明访问焦林义谈话记录。1997年3月3日。

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在接受叶曙明访谈时,谈到军队在介入广州地方文革时,封报事件成为他们衡量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标尺之一。他说:

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全国几乎没有例外,军队只要一介入,支持的一定是保守派。什么叫保守派?就是以工农为主体的,比较拥护、支持、接近党政机关的,主张小修小补的,也就是过去说改良的这么一些群众组织。他们拥护文化大革命,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参加文革,但你说要打倒广东省委、打倒广州市委,他们就感到过头了。撤换某个领导可以,但如果说整个都是黑线,他们就接受不了。

广州是通过几件事来鉴定造反派和保守派的。1966年12月查封《羊城晚报》,造反派说它是陶铸的黑典型、黑工具、黑据点,要查封。那时《羊城晚报》已经改名叫《红卫报》了。原来的报名是陶铸题的字,后来不敢叫人题了,就改成三个黑体字:《红卫报》。但还是换汤不换药啊。造反派要查封《红卫报》,有人就反对。反对的这批人后来就成了保守派,拥护查封的就是造反派。广东的几件大事,封《红卫报》是最早的一次事件。<sup>1</sup>

12月28日,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不得不公开发表声明,对事件作出解释,并重申支持立场,否定了启封和复刊的要求。

中南局《关于〈红卫报〉问题给革命群众的公开信》称:“今年2月份以来,《红卫报》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对推动中南地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应当肯定。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陆续发生了不少重大错误;在报社内部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南局派去的工作组和报社领导也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这些,中南局是负有责任的。报社的这些严重错误,一直改正得很迟,很不得力,因而激起了革命小将们的愤慨,采取了封报的行动。革命小将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对他们这一革命造反精神,我们坚决支持。”

<sup>1</sup> 叶曙明访问迟泽厚谈话记录。2002年7月16日。

尽管《红卫报》是面对中南五省的，但只有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向广州市人民作出了公开表态，完全肯定了封报行动。“省委、市委认为，24个群众革命组织封闭《红卫报》的革命造反精神是好的，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对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决的支持。”接着，省、市委劝告“反封派”：

“最近，有一部分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出于对报纸的关心，也由于对《红卫报》被封闭的情况不大了解，提出了启封、复刊的意见，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中南局已经发出公开信加以阐明。省委、市委完全拥护中南局的意见，并将在革命群众中积极开展说服解释工作，消除一些误解；同时做好《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的发行工作，解决读者一时的读报困难问题。我们恳切希望各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对中南局的公开信进行认真的讨论，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对《红卫报》被封问题取得一致的认识。”<sup>1</sup>

中南局和广东省委想平衡两方，在黄伟经问题上，他们站在报社党委和“反封派”一边，支持对黄伟经实行隔离停职审查；但在封闭报纸问题上，他们却站在“封报派”一边，支持封闭《红卫报》。总之，什么“左”就支持什么。

陶铸也表示同意封报。12月30日，他在北京和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见面时，有如下一段对话：

陶铸：还有《红卫报》，你们封得对，是革命的行动，这个报是办得很不好，原来中南局准备停刊的，但又怕停刊了，不能批判了。同志们提出，为什么我管主编，因为报纸办得很坏，今年2月我管了一个月，组织了一些文章、社论，有些作用。

同学：中南局现在已同意复刊。

<sup>1</sup> 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关于〈红卫报〉问题告全市革命群众书》。1966年12月28日。

陶铸：你们觉得复刊好还是不好？

同学：现在不是复刊不复刊的问题，而是中南局挑动群众斗群众！

陶铸：这我看到一份电报才知道，要彻底揭，以后处理，群众斗群众是绝对不允许的，违背主席指示。挑动是坚决不允许的，要彻底查办，究竟是谁搞的。

同学：你同不同意复刊？

陶铸：我说最好不复刊，看以后怎么样，如改组得不好，就不办算了。

同学：要彻底改组！

陶铸：我支持你们封。办得不好，何必办呢？放毒，又不支持文化大革命。

关于广州本地造反组织与北方红卫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陶铸也表了态：“‘劝架队‘扫流寇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如是省、市委组织起来对待革命师生的，应立即解散。我查一查关于‘劝架队’今天广州来电话，我才知道。马上打电话，中南局、省市委负全部责任。”<sup>1</sup>

黄伟经问题，在社会上影响，毕竟不算太大，而封闭党报，可就兹事体大了。因此，事情的结果，是使天平的一端向“封报派”那边沉下。

“反封派”没有能够启封《红卫报》，“封报派”也没有能够拿出一份新的《红卫报》给读者。对《红卫报》被封问题，他们到最后也没有取得一致认识。直到13年后，文革已成陈迹，1980年2月，《红卫报》才重新以《羊城晚报》这个老招牌正式复刊。■

<sup>1</sup> 《陶铸回答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问题的实况》，1966年12月30日。载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资料组、新北大公社彻底批判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彻底揭露陶铸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

【访谈】

## “红八月”：家庭出身·抄家打人

章立凡口述 杨东晓记录

1966年8月23日，北京市开始抄家，第二天，清华园内已经变得非常恐怖，红卫兵把清华大学著名的标志性历史建筑“二校门”推倒了，还把“黑帮”（校领导）和右派赶到现场，他们在人群的围观下，一边被皮带抽着，一边汗流浹背地搬砖头。

我当时就读的清华附中，与清华大学仅一墙之隔，瞬间风云突变，红卫兵们开始清查和殴打本校“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和老师，且波及到学生家长和校工。

这天晚上，我回到宿舍的时候，就发现状况不对，那时候暑假刚刚结束回到学校，我新置的一顶蚊帐被撕碎了，床上也弄得乱七八糟，还有一张大字报，倒不是贴的，就是放在我的铺位上，写着：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快滚蛋！

这种气氛下，我决定回家。此时天降大雨，趁着夜色苍茫，我从校园的一处栅栏缺口钻出来，蹚过小河上了公路。正好来了一辆公交末班车，我很顺利地登车，回到城里，然后换乘无轨电车回家。我刚刚下车，就有一群红卫兵拥上电车，挨个查问坐车的人，你什么出身？你什么出身？

那时出身变成最敏感的问题，甚至是生死攸关。为什么呢？此前暑假期间，北京城里就开始流行一幅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对联”在北京各学校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暑期中有个“返校日”，我刚回学校就被要求去参加一个集会，地点在清华大学的大操场上，有人带领全体唱一首歌，歌词其实就是演绎那副“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最后齐声喊三遍“滚他妈的蛋”。当时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在这个会场上非常不自在，既不能不唱，也

唱不出声来。从那时起，我对于所谓“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一定的预感，感觉危险正在向自己逼近，但危险到什么程度，一时还想象不出来。

学生之间彼此明确所谓的阶级出身，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此前，自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阶级”概念在学校教育中已经变得非常之重要。但那个时候还讲“出身不能选择，道路是可以选择的”，留有一点余地。但是到“对联”出现以后，就变成另一种绝对化评判，你的父母是什么人，你就是什么人，就连“道路可以选择”也不存在，是彻底的“血统论”了。学生中直接分为“红五类”（家庭出身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和“黑五类”（家庭出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前者是“好汉”，后者是“狗崽子”。除了这两部分人，还有一些出身非红非黑的人，他们也要求革命，还成立了一个叫“红外围”的组织。把人群贴上左、中、右标签，这其实是中共传统的政治分类法

8月25日上午，我又回清华附中一探究竟。看见有女同学被剃了“阴阳头”，被强迫劳动（拔草），红卫兵正在用皮带抽打一位据说是“破落地主”的老校工。我走近教学楼时，同班的同学已经在楼上看见我了，有人在喊我上楼。我想了一下：不能上楼，我必须逃走。这会儿是大白天，和昨晚上不一样，我如何逃走呢？我走进教学楼正门，穿楼道从旁门走出，这次不能再钻栅栏了，只能走西校门。校门口有一位高年级同学把守，我把心一横，装作若无其事，大摇大摆地直奔而去。这位同学瞥见我走来，把头一偏，任凭我走了出去。就这样，我闯关成功，二次逃出生天。当时我是初二学生，他是高一或高二的学生。我内心很感激这位同学，用我们今天常说的话，叫“枪口抬高一寸”，把我给放生了。

从1966年8月23日开始，“破四旧”的狂热已经开始沸腾了。我们清华附中的学生、红卫兵也已经开始到老师家里去“破四旧”，“破四旧”，其实也就是抄家。

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家里人“有问题”的老师，或者是被打成“右派”的老师。比如我们班主任，她丈夫是清华大学的“右派”教授，家里就被我们班的红卫兵去破了四旧。他们回来后还很得意地说，把她家一个非常大的古董花瓶给砸了，“王老师很心疼”。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情况不对，于是，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说现在到处都在抄家，家里怎么样了？他说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了，但是他还能应付，叮嘱我不要回家，我打完这个电话就回到学校。

第二天是8月24日，清华园里的抄家进入了高潮。清华大学标志性的建筑“二校门”被推倒了（实际上是座西式牌坊，匾额上刻有前清大学士那桐题写的“清华园”三个字）。还把所谓的“牛鬼蛇神”，即当时的校领导刘冰、何东昌等人，还有“右派”钱伟长、黄万里等，都赶到那儿去搬砖头，并不断用皮带乱抽他们。

这个时候清华园里就显得非常的恐怖了，我还看到搬砖头的人群中，被他们赶着过来的一个人，她被称为“善格尔公主”，是一位蒙古王爷的后人。清华大学校园里有不少房子原来是私人的，善格尔公主是其中比较大的房产主。红卫兵们用皮带抽她，命令她搬砖。我还看到一个女红卫兵，用皮带一路追着抽一位大学生，说他是反动学生，据说这位大学生的父亲是上海基督教会牧师。

当时路边的旁观人也有人喊“不要打人”，女红卫兵说：“毛主席叫我打的”。一开始我脑子还没反应过来，怎么会是毛主席要她打的呢？过后才醒过味来：8月18号那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有一位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叫宋彬彬，上前给毛佩带红卫兵袖章，毛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宋回答：是。毛似不经意的说了一句话：要武嘛。这个女红卫兵显然认为：既然伟大领袖指示“要武嘛”，她用皮带打人，就是在执行领袖的指示。

整个清华园的状况非常混乱，使我感觉到相当不安全。

此前一天，就是23号开始抄家的那天，我们班有一位同学，他爸爸是老清华社会系的主任，后来社会系撤销了，没有他的专业了，他只好到图书馆去当馆长。这位同学看见他老师家里被抄，就很担心，私下里跟我商量：怎么办？会不会到我们家来？我说。你提前把东西先藏起来呀。他就邀我到他家去，帮他藏东西。我到了他们家，帮他把家里的存折什么的，藏到镜框后面。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也很天真，以为这样可能就行了。

总之，我们当时还做了一点预防。

我回到母亲的住处，她说已经去打探过灯草胡同章宅，发现我父亲的住所大门敞开，门外有一群邻居窃窃私语，说“带走了，带走了”。但是带到哪里去了，都不知道。事后我才知道，他和当地一些所谓的“牛鬼蛇神”，都被红卫兵带到了东安市场北侧的吉祥戏院。在那儿有一个“打人集会”，附近所有的“牛鬼蛇神”、“黑五类”，都送到那儿去挨打。大概过了一个月以后，我父亲对我讲，当时他周围的很多人，都被打得咽了气。父亲一直练气功，内功功力比较好，就运气顶着，我想这可能就是小说里那种“铁布衫”的功夫，但皮肉伤肯定是难免的。

后来他也被打得昏迷过去，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当地的片警，他对红卫兵说，这个人我们得带走，这个人你们要是打死了，我们不好向中央交代。

“红八月”里抄家这件事，实际上北京市公安局下达过一个文件，那就是警察系统要配合红卫兵。所以，各地区的街道，该抄谁家，其实是有名单的。红卫兵并不熟悉这些街道的情况，他们都是按名单来决定抄哪家，当然，也有一些是派出所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供的名单之外的，他们通过其他一些途径获知要抄哪一家。例如我家被抄，据说是因为当时我父亲的关系还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国管局的一个员工对她的孩子说，有这么一家人，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然后他们一帮学生就去抄家了。

有位旅美女作家张欣欣，她当时还是一个小学生。在她的一本自传体小说里，唯一非虚构真名实姓的人物就是我父亲。小说中记述了学生们一起去抄我家的经过，她还特别提到一点，我父亲当时拿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宪法》的，《宪法》保护共和国公民住宅不受侵犯，是有这一条的。当然这并不能阻止抄家。

文革中能够拿出《宪法》来讲理的人，我知道除了刘少奇这么做过，我还知道我父亲做得比刘少奇早。但不知是否还有其他人也这样做过。

“红八月”里，暴行每天都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发生。现在还是回过头来，谈谈我所知道的其他人家的情况。

刚才提到，母亲居住的那条胡同里，有好几位邻居被打死。其中有一位女士叫张洁凤，她跟我母亲很早就认识，也常有一些来往。张洁凤是美洲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的遗孀，年龄并不大，不是司徒美堂的原配，据说原来她是老先生身边的一个使女，后来收房做太太了。老先生过世的时候，她还很年轻。司徒美堂先生是一位传奇的人物，当年孙中山先生到美洲去宣传革命，主要是得到了美洲洪门致公堂的支持，司徒美堂就是致公堂的大佬。中山先生也是美洲洪门致公堂的“红棍”（会党中的执法者）。当年美洲华侨踊跃地给革命党募捐，都是通过致公堂的组织 and 关系。

司徒美堂后来跟蒋先生闹翻了，他是支持中共的。1949年，他也被请回来参政议政，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人大常委）。他在1955年过世，当时周恩来、廖承志等都出席了他的葬礼。张洁凤享受着司徒美堂遗孀的待遇，她年纪还很轻，还是很想结婚，但是如果结婚了，她可能会丧失这个待遇。她就做了一个变通，她与云南的一位陈姓工程师，悄悄地在外地结了婚，还生了一个女儿。她把女儿带回北京来，对外说是抱养的。其实呢，我们知道内情的人都知道，这就是她的孩子。

这样就引起了人们对她的闲言碎语，说她作风不正派。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是有婚姻关系的。但她这种情况，在运动中间就很麻烦了。她跟同院的邻居关系很不好，这邻居是老先生生前的警卫员，对她家的事都门儿清，为了占她的房子，就去向红卫兵告密。红卫兵来抄家，把张洁凤吊在房梁上打。那时她的孩子还很小，只有四五岁。打到奄奄一息的时候，她哀告说，看在孩子面上你们饶了我吧，再打我就不行了。当时派出所的片警说了一句“革命怎能不流血？”红卫兵就继续打，结果把张洁凤打死了。打死以后，这小女孩就没有妈了，徘徊在街道上。有人可怜她，就给她点吃的。她每次见到我，都会叫“哥哥”，我心里很难过，我没有钱，也没有带吃的东西。

这样大概到了9月份，或者更晚一点的时候，我走在胡同里看见这么一幕：小女孩的爸爸来了，两人手里各拎着一个小白包袱，从张洁凤家出来，沿着胡同往外走。有几个居委会干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小脚侦缉队”，远远地跟着父女俩。小女孩儿不晓事，看见我

就叫我“哥哥”，但是我不敢公然地回答她。点点头，不作声，也顺着同一方向走。拐出胡同东口的时候，后面小脚侦缉队还没跟上来，就有了说话的机会，我就对她爸爸说：“她妈妈是被打死的”。把我知道的情况，简要地告诉女孩的父亲。这时也走到电车站了，后面小脚侦缉队也跟上来了，我们不能再说话，目送他们上车走了。

第二年，他们又到北京来过，还找到我。那位陈工程师跟我谈起他得知出事的经过。抄家高潮中，大家都断了联系，也没有北京的消息了。幸亏司徒家族在北京有人，著名雕塑家司徒杰的夫人写信给他，说他的妻子出了大事了，他才赶到北京接走了女儿。

这一次来，他主要是想要讨个说法，他也查到是哪个学校的红卫兵打死了他的太太。另外，他想要发还被查封的财物。但这些都没有实现。母亲和我只是比较详尽地对他讲了我们知道的情况。但那时文革还在继续，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

十年文革结束，大概是在1979年或1980年，我忽然接到一封信，信上说“我和爸爸来北京了，想约你某月某日某时到北海公园后门见面”。我想了半天，想不出来是什么人，但总应该是认识我的人，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我也就不管别的，就按那个时间去了。

原来是这父女俩又来北京了，这一次他们还是想要落实政策。这时候整个大形势变了，文革结束，正在落实政策，我觉得自己能帮上点忙。当时他们在向统战部申诉，国家侨委也在帮他们说话。女孩的父亲拿了他们写的申诉材料给我看，那时我写这类东西已经很有经验了，懂得给领导写呈文应该怎么写，写多长，用什么方式提要求，等等等等。我一看，就说这个写法不行，又帮他们重新写过，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得到消息，已经发还了他们的财产，给小女孩安排了工作，他爸爸也定居在北京。此后，我们也曾经有一些来往。

毛接见红卫兵后，全国的革命师生就开始了“大串联”。大串联，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无法想象到的事情，就是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免费乘坐火车，到全国各地去进行所谓“革命串联”，各地都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免费提供食物、住宿等。等于是白吃、白住，可以走全国，由此引发了一场人口大流动，这个大流动不是因为经济，纯粹是出于政治原因。

像我这样的出身不好的人，出去串联是最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允许出去，而

出去也要开一封介绍信，才能够被接待。我的一个同学也属于出身不好，他找到我说，听说现在我们可以去了。于是我俩就一块到清华附中革委会开了介绍信，一起南下。初步计划去苏州和上海。我母亲有一个老同学在苏州，我叫她张阿姨。我父亲也跟我说，你要到苏州可以替我去看看周瘦鹃，周先生是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我也很想认识他。我就怀揣着这些使命，同时怀揣着父亲给我的二十块钱南下了。一路上其实真的不需要什么钱，食宿都有接待，只是火车非常的恐怖，那时候火车挤到什么样？挤到连座位底下都睡人。

我到上海看了我的舅舅。我也到了苏州。我妈妈的那位老同学，她的父亲叫张一麇，曾经是袁世凯的秘书，抗战时期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早就过世了。我妈妈让去看望的张阿姨，租住在苏州一位朋友的宅子里，地址是苏州富郎中巷10号。我找到此地，发现大门紧闭，门上贴着封条，就问街边一个小女孩，这家人怎么了？这是不是叫顾乃文的家？小女孩说“顾一乃一文？她一死一嘞！”

我大吃一惊，马上改口说我不是找她，我是找他们家的房客。这时有一位邻居走过来，指引我顾家房客搬到了附近的什么地方去了。苏州人还是相当和善斯文的，如果在北京，你去打听这么一个事儿，立马会遭遇“小脚侦缉队”的盘问。但苏州人好像就没有这种习惯，政治气氛没有北京那么浓。我很快找到了阿姨。红卫兵抄她房东顾乃文的家，连带着把她家也给抄了。张阿姨的女儿跟我是发小，我也想看看这位小妹妹，但是没见到，她跟着学校学农去了。我和张阿姨相互诉说各自家里的情况，觉得她挺乐观的，我也挺放心，在那吃了一餐饭就走了。

然后我就打听周瘦鹃，听说他也被抄家了，我没办法找到他，就放弃了找周瘦鹃的使命。后来才知道周先生不在了，是跳到他家花园的一口井里自杀的。

我母亲和张阿姨一直有联系，又过了一段时间，到“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这应该是1968年了，联系突然断了。得到一个不太确切的消息，说她和她女儿都自杀了，但母亲始终不肯相信，她坚持认为，张阿姨自己没有什么历史问题，绝对不会死的。直到文革结束以后若干年，母亲一直没有放弃要找她这位老同学的念头，有一天忽然想起，张阿姨在北京还

有一个弟弟，这弟弟是从小送给了另一家人了。我们辗转托人打听，得知她弟弟也不在了，找到了张阿姨的弟媳妇。我跟这位老太太说，我是章某人的儿子，我妈妈是张阿姨的同学，老太太很平静地说，我还记得令堂，可惜你要找的张阿姨已经不在。后来我又提张阿姨女儿的名字，我问她怎么样？老太太一下子就哭出声来了，说她把女儿也带走了。

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老太太跟我讲，当时张阿姨全家的生活，就是靠她先生的工资，但是她先生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被囚禁起来了，工资也停发了，她家就断了生计。这位张阿姨是一位非常自尊的母亲，不能够忍受没有尊严的生活，所以她就带着女儿一起自杀了。

直到昨天我才听说，刚才讲到的清华园里那位蒙古公主，她后来在圆明园边上搭了一个窝棚，就像野人一样住下了，她的女儿给人打零工。后续具体情况还有待了解核实。

文革是1949年后由官方发动的一场最广泛的暴力运动，它不像以往什么镇反、肃反这一类的暴力（那种暴力还需要走一个形式上的司法程序），这次是全社会的、公开的、甚至算是合法的暴行，包括对公民生命、财产的任意侵犯和剥夺。

当然，这场暴行的规模，也不仅限于其发祥地北京，很快波及到全国各个地方，甚至到最基层的村镇。例如湖南道县发生的大规模屠杀事件，广西发生的大规模的屠杀、甚至吃人肉的事件。还有北京郊区的大兴和昌平，都发生了对所谓“四类分子”的屠杀。这些当然是比较极端的事件，但这种暴行在各地蔓延，全中国陷入一种疯狂的状态。属于精神病学上的“精神病流行”状态，全国变成了一个大疯人院。

在一个“互害体制”下，年轻人是最好利用的，他们正处在青春的叛逆期，对于任何压制他们青春冲动的环境，都会有本能的反叛。而文革的发动者恰恰利用了这一点，不仅利用了青年人躁动的情绪，也利用了人民群众对官僚体制的不满情绪，以此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来打倒政治对手以及所有想整肃的人，然后随时可以无情抛弃被利用过的人们。2012年我参加一个研讨会，主题是反思共和国第二代。我在会上有个发言，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发表时整理者加了一个标题：“我们是怎么被利用的，为什么会被利用？” ■

【述 往】

## 木寨小学斗老师

王俊义

1966年8月份的一天夜里，县里的放映员到我们村子里放电影。平时在放映主片之前，都要放《新闻简报》，但是那天夜里放映之前，把新闻简报省略了。放映员拿起话筒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今天放映之前，我们先学习毛主席语录。”放映员姓王，留着一个偏分头，普通话说得不好，但还是很流利的给大家朗诵“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朗诵之后，他又唱了起来，唱完之后，他说：“文化大革命在县城已经开展起来了，各个公社也开展起来了，但是大队还没有开展。从今天起，你们木寨大队的文化大革命，也就算是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就是斗争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木寨大队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哪儿？就在木寨小学里边。明天，你们就要在学校里，斗争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了”。

那天夜里，放映的是《突破乌江》，那部电影里有一个细节，至今还记忆犹新——一个国民党军队的旅长对他的士兵说：冲上去，五两烟土。电影结束我们踩着月色往家里走，大家都模仿着敌人的旅长，有些结巴的说：“冲上去，五两烟土”。而在内心里，却对明天在学校里斗争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样的事情，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激动和期待。毕竟那是小学生们第一次面对规模宏大的斗争大会，也不知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是谁？

第二天上午八点多，木寨大队二千多人，只要能走到学校的，都到了木寨小学的院子里。

学校是一座叫做扫癣庙的庙宇改建的，大殿里的墙壁上彩画的二十四孝图还很清晰。校园很大，四周长满了木槿花，枝头上缀满了紫色的花朵。校园子里有一座戏楼，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县剧团在戏楼上演戏，乡村的大的政治活动，也在校园的戏楼上下举行。召开斗争大会，就是乡村主要的政治活动。戏楼朝东，看戏的时候，学生面向戏楼坐在最前边，

贫下中农和地富反坏右掺杂在一起，站在最后边。召开斗争大会的时候，学生们的位置不变，贫下中农的位置不变，只是地富反坏右坐在校园外边的篮球场上。等到大会开始，主持会议的人高喊：“把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揪上来”，或是“把地主分子揪上来”，“把右派分子揪上来”……就有两个专门揪人的跑出校园，架着一个斗争对象进来，一直把他驾到戏楼上，先把斗争对象的头摁下去，然后再扳起来亮相，最后主持会议的人声色俱厉的说：“把敌人绑起来”。揪人的那两个人就拿出放在戏楼上的绳子，把斗争对象绑得严严实实。就是个子很高的斗争对象，被绑之后也忽然低了，弯着腰站在戏楼上供大家斗争。特别是亮相的片段，给人的印象很深。后来看到陆定一和薄一波的亮相照片，跟木寨的地主富农们亮相没什么两样。在斗争人这方面，很小的村子和北京是一模一样的，是高度一致的。

这天，为了显示斗争大会的重要，地富反坏右分子每人拎着一个守法公约的木牌，走进了校园。被大队治安主任命令蹲在木槿花后边的空地上。隔着木槿花篱笆，蹲着十七个木寨小学的老师。一道篱笆，一边是地富反坏右，一边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老师里边有出身好的，也有党团员，他们被划分到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里边，很不高兴。

斗争大会开始了。主持会议的人，在戏楼上很生疏地念着造反有理的语录。然后高声叫喊：“把木寨大队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庞广甫揪上来！”两个专门揪人的人，抓住了大队支部书记庞广甫，架着他的胳膊往戏楼上跑。庞广甫年纪较大，跑得慢，摔倒了，被两个揪人的拎小鸡一样拎起来，继续跑，参加会议的人们一边高呼打倒的口号，一边哈哈大笑，斗争会变成了社员们的狂欢节。大队支书站到戏楼上，头被摁了下去，然后被绑起来。过去支书在戏楼上是主持斗争别人的，忽然轮到了自己，很不适应。

接着，主持会议的高声叫喊：“把木寨学校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豫西十三县反革命民团司令刘顾三的孙子刘道太揪上来！”天啊，木寨学校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原来是刘道太，同学们有些吃惊。刘道太平时喜欢穿一件蚕丝绸上衣，见了同学，没有威严，甚至有些点头哈腰。他是地理老师，很会讲课，学生们爱听。他还会讲故事，能讲出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铁道游击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能

根据学生的特点，删去恋爱的章节。每逢周六下午，全校集合听他讲故事，是上小学时最愉快的记忆。没有想到他竟然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竟然跟十三县的司令有这么近的关系。

刘道太年轻，听到揪自己的喊声，就飞快往戏楼上奔跑。因为他害怕那两个揪人的人推倒他，再揪起来，那个过程是很不好受的。刘道太跑的快，他比揪他的人先跑到戏楼上。自己低下头，挨着庞广甫站着。那两个人很生气，就用绳子把他绑起来。他跑得快，受到的惩罚也厉害，绑他的时候，两个人把绳子收的很紧，几乎把他绑成了一个毛蛋。

主持会议的人说：“拿墨水来”。

学校的总务离开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位置，把墨汁和广告色拿到戏楼上。就有几个六年级的学生跑到戏楼上，对着刘道太的蚕丝绸子衣服泼墨汁，抹广告色。瞬时，刘道太的上衣，就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

主持会议的人说：“给刘道太戴上高尖帽。”几个学生就跑到戏楼后台，拿出准备好的高尖帽，戴到刘道太的头上。高尖帽上粘贴着几张纸条，写着打倒刘道太，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斗争人的过程是很难把握的，刘道太一会儿被推到戏楼前边，一会儿又推到戏楼后边。陪同被推的，还有支书庞广甫。

人被绑着推来推去，掌握不了平衡，很容易倒在地上。没有手的扶持，也很难站起来。因此，把他们推倒，再让他们站起来，就成了大会的高潮。刘道太绑的厉害，倒地之后就更难站起来。当他战战巍巍终于站起来的时候，再次把他推倒，再次命令他站起来。这个过程让人群欢呼雀跃。

主持会议的人说：“开始揭发斗争”。

刘道太就站着回答问题。一个学生说：“刘道太，你讲地理课说，北极的天冷，人活的时间长。是不是想让苏联修正主义活的时间长”？

刘道太回答：“不是。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是这样讲的。”

另一个学生问：“刘道太，你讲地理课说，非洲离赤道近，天热，人的岁数小。是不是想让我们非洲的朋友死得早？”

刘道太说：“不是”。

就有人呼口号：“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一大队的人都跟着呼口号，声音大的可怕，大殿前面柏树上的鸟被惊吓的飞走了。

农村学校的学生年龄偏大，一个六年级的女学生，大概有15岁的样子。她气呼呼地问：“刘道太，你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啥不讲保尔和冬妮亚的恋爱，我们最想听的你都不讲，是不是你想娶个冬妮亚那样漂亮的资产阶级老婆？”

台下边的学生们笑了起来，刘道太想笑不敢笑。他说：“是校长不让我讲那些情节”。

由于这个女学生干扰了斗争会的大方向，斗争刘道太暂告一个段落。主持人高喊：“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伪司令的干女儿潘云英揪上来”。

潘云英是我们低年级的老师，很干净，长得很白。她来到我们学校，基本颠覆了农村的孩子对于女人邋遢的看法。原来，女人也可以这样干净的。潘云英被揪上来的时候，身上已经滚了一身灰尘，因为女的跑得慢，在到戏楼上的过程里，摔倒了三次。

潘云英的衣服被墨汁泼黑了，又涂上了一层广告色。几个男人走上戏楼，掏出剪子，把潘云英的头发剪掉了，几乎成了一个光光头。一个漂亮的女老师瞬间成了另外一个人。斗争潘云英的过程和斗争刘道太是一个模式，但是那样对待一个女人，在农村还是第一次。

斗争会后，刘道太到我们生产队，和地富反坏右享受一个待遇，潘云英到另外一个生产队，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一样干活。只是农村的女人们散着头发，潘云英勒着一个头巾。一个女人被剪掉头发，是很难堪的。北京斗争王光美是侮辱性的，木寨斗潘云英也是侮辱性的。人生失意无南北，在哪儿挨斗争都是一样的啊。

时间过去很多年，那些没有被斗争的老师，已经彻底忘记他们姓甚名谁了，而刘道太和潘云英老师还被记忆着。一个人的身上，有块伤疤，会被这个人记着。一个民族有块伤疤，也应该被一个民族记着。我们刻意要忘记自己身上很大的伤疤是怎样来的，或许不经意间，在那个伤疤的旁边，还会留下一个同样的伤疤。■

【资料】

## 北京市档案馆 1966 年市教育系统《文化大革命动态》摘录

### 教育系统文化大革命动态

1966年8月25—27日三天红庙小学一连打3人。大钟寺小学有8个教师被编为“劳改队”，学生们对他们随便抽打。皇城根小学学生抓到一个小偷，捆住手脚，痛打一顿。东南园小学学生斗争“当权派”，开始时给挂牌子，低头罚站，后来就棍打，剃光头。他们认为这是坏人，坏人就是该打，斗争太文了气氛不够，“不打不成招”。■

摘自《文化大革命动态》第4期

### 教师被斗争和抄搜家的情况

小学教员中被斗争、搜家的人数较多，据小学组反应，小学教员中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比较多，在横扫“四旧”的群众运动中小学教师队伍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被斗争、搜家的人数比较多。

东城区了解91所小学，截止8月底被斗争、搜家的有349人，占教员总数的10%，其中被搜家的有184人，八面槽小学共有教员60多人，被搜家的有26人。宣武区二师一附小50多名教员中，有21人被斗争，丁字街小学有教员37人，被搜家的14人。西城区鸭儿胡同小学（全校有教员50多人），9月1日斗争了17个“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人，将他们额头上写上字，站在台上，从早上8点一直斗到夜里1点，斗争后不让回家，绑着关在屋里。

目前，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都感到惶恐不安，担心自己出问题，有的下班后赶紧往家跑，到了门口，还要先看看有没有红卫兵，才敢进去。■

摘自《文化大革命动态》第6期

## 有些教职工被遣返原籍

东城区各小学至1966年8月底统计，有18个教员、30个教员的家属被遣返原籍。宣武门菜园小学教员韩××，因其父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学校也叫她随其父返原籍劳动，户口已被撤销，令其立即离京。朝阳区水南庄小学教员，苏××（团员），父是资本家，在北京冶炼厂，苏××主动将家中存放的财物交给工厂红卫兵，但是工厂和学校仍然决定她与其父一道遣返。有的人不愿返乡提出与家庭断绝关系，与丈夫离婚。

东城区和平里二小教员王××，地主家庭出身，因贴过大字报表示不同意公布教员阶级出身，被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遣返原籍后，那边不收，又返回北京来，可不敢回校。

几天来，有18个出身不好的小学教员，分别来市委反映，他们接到了限期回原籍的通告，询问市委有无政策界限，对他们是否同黑五类一般看待。■

摘自《文化大革命动态》第8期

## 一个月来小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

在革命群众运动迅猛发展的形势下，有不少学校的领导害怕烧到自己头上，在运动面前躲躲闪闪，不敢站出来到革命师生中积极领导这场革命，大部分学校领导，陷于瘫痪状态。有的甚至站在革命师生的对立面，压制革命。有些学校出现了争夺文化革命领导权的局面，斗争十分激烈。

从6月16日以后，6个区的547所小学中，动起来的学校达到85%，其中比较复杂，斗争比较激烈的学校达40%左右。广大革命师生纷纷揭发学校中的问题，揪出了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许多中学也前来送大字报，到学校声援。据海淀区统计，该区80所小学，6月份共贴出大字报10.3万余张，平均每校1209张，其中，第一批集训的16所小学，贴出大字报3.8万多张，平均每校2160张。

根据东、西、宣、崇、海、朝6个区初步统计，截至6月25日止，被打了的483人，

被斗的 371 人，戴高帽子的 126 人，罚跪的 19 人。6 月 14--23 日，每天来访平均达 240 起，最高达到 270 起，由于学校面广，队伍庞大，运动迅猛而工作队人数又太少，整天忙于应付，相当被动。■

摘自《文化大革命动态》第 23 期

据西城区 73 所小学初步统计，被搜家抄家的有 504 人，占教师员工总数的 37.8%，其中本校搜抄的 61 人，外单位（包括街道）搜抄的 443 人。搜抄后东西被查封的 33 人；东西被收走的 206 人，一般查一下的 171 人；情况不清的 94 人。

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或因其父母、夫妻和其他亲属有问题而搜抄的 425 人，占搜抄总数的 84%。因本人有问题而搜抄的 79 人，其中有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坏分子、房产主、小业主、摘帽右派、伪官吏、有反动言论或者是被群众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天主教徒等等。■

摘自《文化大革命动态》第 24 期

### 崇文区东花市二小的干部受辱

崇文区东花市第二小学教师崔××于 6 月 13 日纠合了 4 个人组成“领导小组”，把持了学校的电话、广播，强占了校长办公室，封锁了校内外的联系，在学校煽风点火，给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路×扣上黑帮分子的帽子，从 1966 年 6 月 15--25 日连续开了 5 次斗争大会，煽动师生殴打路×，往脸上涂色画画，往身上贴标语，戴高帽，让路手托“大王八”，揪头发、啐痰、泼水、扬土、拳打脚踢、打嘴巴，每次斗争，殴打长达四、五个钟头，有一次斗争了 20 个钟头，对路×残酷地进行肉体折磨和人身侮辱，还逼迫路×交出党内密件和党内会议记录。路×坚持不交，就让路×跪在搓板上，两手撑地，披头散发，把两脚平放在路背上，按路的头，朝路脖子上浇水。■

摘自《文化大革命动态》第 33 期

【资料】

## 北京市普教资料选编

### 《“四人帮”在“文革”中对普教事业的破坏》摘录

#### 西城区原女三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沙×同志被迫害致死

沙×，女，1917年生，河南信阳人，高级师范文化程度，1940年7月参加革命，1941年入党，1957年调到北京市女三中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行政14级。

在中国革命长期武装斗争的年代，在抗日战争的沙场上，在解放战争的硝烟里，沙×同志舍生忘死，英勇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她不畏艰辛，努力工作，为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献出自己的全部心血。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使沙×同志在精神上受到折磨，在肉体上受到严重的摧残，她始终是严守党的纪律，勇敢捍卫真理，宣传党的政策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表现了共产党员无所畏惧的高尚品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女三中被污蔑为“黑线专政”，党支部是“黑帮”，沙×同志是“黑帮头子”，给她挂上“牛鬼蛇神”的牌子，将沙×同志为主的党支部成员的干部、党员和老教师打入“劳改队”，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甚至把沙×同志于1966年2月份多交纳2000元党费的行动，也作为一项罪行来批斗。在劳改队经常遭到恶骂、毒打、做苦役、罚跑步、揪头发、撕衣服、浇墨水、逼唱嚎歌。情况最严重的是1966年8月19日的上午“四人帮”在全市导演了一场武斗、打砸抢的示范演习后，女三中红卫兵，当晚就紧跟执行。他们对沙×同志秘密刑讯一夜，由三四个人轮流用武装带蘸着水，劈头盖脸猛力抽打，每打20下就泼一桶凉水，就这样惨绝人寰的严刑拷打搞得通宵达旦。20日上午，女三中召开所谓控诉大会时，沙×同志已被打得血肉模糊，遍体鳞伤地被拖到会场，抛在地上，尽管沙×同志生命垂危，举动十分艰难，但神态坚定，临危不惧，凡是逼她承认而无中生有的所谓“指控”都一律加以拒绝，并据理力争，保护无辜的教师，沙×同志

越是坚持真理，暴徒们越是仇恨凶残，他们下了毒手，对鞭伤棍痕，身体羸弱不堪的沙×使用了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暴虐手段，又是武装带猛力抽打，乱棍像雨点般地落在沙×同志的头上，又是拳打脚踢，撕拽头发，无所不用其极，有一个家伙，竟然踩在沙×同志的身上进行拍照，留下惨不忍睹的镜头，沙×同志为实现最崇高的信念、理想和“四人帮”坚强斗争，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惨遭杀害，壮烈牺牲，终年49岁。■

（此稿根据沙×同志的爱人章×同志谈话后整理，并经章×同志阅过）

### 东城区分司厅中学干部陈××被迫害致残

陈××（女）原籍是江苏省宜兴县，1925年3月26日出生，现年60岁。（1984年9月离休，中教三级）离休前任分司厅中学教导主任。她于1943年7月毕业于江苏省第五临中高中师范科，解放前从1943年9月开始在国民党统治区江苏宜兴、常州、南京等地做小学教师。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被保送去南京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0年参加共青团，195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0年5月随爱人工作调动来京，分配到北京东四区第二中心小学任教师，1952年任东四区第二中心小学教导主任；1957年任分司厅中学教导主任（党支部委员）直至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

文革前分司厅中学有学生1800多人（35—37个班），教职员工110多人，校长陈××是老解放区×城的老干部。学校教学任务由陈××负责。文革前该校在社会上声誉较高，教师干劲足，学校校风好，在语文、数学等教学上，也曾受到区里好评，学生升学率较高，这些成绩在文革中便成一大罪状。

从1966年9月陈××就作为走资派被批斗，批斗时要弯腰、低头、架飞机，有时跪在学生课桌上，头发被剪掉了。学校红卫兵私设公堂，对她进行审讯。陈××在9月一天夜里，被拉去打了一夜，用皮带抽，木板打，后背皮开肉绽血肉模糊，褂子全被血水浸透了，（事后幸亏校医王××同志同情，偷偷地给上药治伤。）

“文革”期间，她长期被专政“劳改”，砸煤、运煤、扫地、升炉，天不亮就起床烧火，晚上推垃圾。秋天霜后命令扫校内树叶，不准地上有一个树叶，即使拼命扫，也不能保证地上一个树叶没有，本来体质较差，累得头昏眼花。从1966年9月—68年3月就这样长期被专政、批斗、“劳改”，每次批斗后头昏眼花。1968年2月13日第一次高血压脑出血，学校无人过问，幸亏爱人将她急送宣武医院，住急诊室抢救（脑蛛网膜出血）脱险，住院不到一个月，学校革命造反派到医院使坏，病未完全好，医院强迫出院。接着“清队”开始，学校革委会贴出大字报，勒令陈××把存款全部交出。陈没有交个人存款，便把陈××的工资全部扣了，每月只发12元生活费。病体并未完全恢复健康，还是继续强迫劳动，受批斗，有一次批斗后出门时被后面人推下几层台阶，脸、手摔肿了，筋骨疼了几天。

林彪事件后，1972年恢复了她的党籍，撤销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不恢复职务，叫她看传达室，星期日都得不到休息，以后在教导处又干些杂活，长期受到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和摧残，头昏得走路常常摇晃，驻校工宣队还当面指责：“过去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你干的挺积极，现在你为什么就不积极？”由于这些冷嘲热讽，与1973年12月2日又第二次脑出血，经第六医院治疗（住院三个月），留下后遗症半身瘫痪，从此也就不能工作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由东城区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结论：“属于四人帮政治路线迫害致残”改发全工资。1978年12月三中全会后，又将过去扣除30%病号工资补发了。

“文革”期间分司厅中学造反口号是“打倒二陈王朝”。校长陈××，也经受批斗、被学生捺在校院剪头发，装金（往她身上撒沙土）。从未经过这样屈辱，是受不了的，她精神抑郁，得了脑血栓不能说话了，1973年与世长辞。■

（1985年11月陈××口述，其爱人苏×代写）

【资料】

各区县落实政策的人数情况

各区县落实政策的人数情况																			
(摘自市教育局财基处 1979 年区县申请落实政策经费报告)																			
	东城 区	西城 区	崇文 区	宣武 区	朝阳 区	海淀 区	丰台 区	石景 山区	石化 区	门头 沟区	昌平 县	通 县	顺义 县	大兴县	房山 县	怀柔 县	密云 县	平谷 县	延庆 县
返京复职	95			34			43	32		10	16	11	265	108	36	3	13	35	9
返京退休	111				10					4				11		2	10		
错判徒刑	3						3								9	1			
审查批斗 扣工资	12			31			11			5	3			35	12	108			
扣发煤贴	306			281	200						3			108					
迫害死亡	58			23						9	16		33	15	41		16		1
迫害致残				6			5									12			
抄家														20 户	35 户				
总计																			

(摘自市教育局财基处 1979 年区县申请落实政策经费报告)

西城区对文革中中小学教职工

受迫害及落实政策调查表

(1984. 5. 10)

	立案审查数	完成数	未完成数
遣返	中学 114 人	114 人	0
	小学 104 人	104 人	0
	计 218 人	218 人	0
查抄	中学 613 人	572 人	41 人
	小学 138 人	103 人	35 人
	计 751 人	675 人	76 人
遣返 补发 工资	中学 131 人	128 人	3 人
	小学 97 人	97 人	0
	计 228 人	225 人	3 人
非正常 死亡	128 人 (中学 96 人, 小学 29 人, 幼 3 人)	128 人	0

(摘自西城区落实政策办公室)

【本刊声明】

##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mailto: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景山

本期校对：立新 尚在田 续霜红